

「君臣大義」與東、西魏政權的建立和穩固*

胡勝源**

北魏末歷史發展的趨勢，是群雄競相以「君臣大義」口號成就霸業。高歡能打敗尔朱氏，是高舉「君臣大義」旗幟深得人心之故；而宇文泰能擊敗侯莫陳悅，使孝武帝入關建立西魏，亦是依循同樣模式。東魏國力雖強，卻因孝武帝西奔，人心渙散。高歡為此極力尊君、包容貪腐、屢次興兵西討，企求強化統治正當性；西魏國力雖弱，卻被時人視為代表北魏的正統政權，「挾天子」的宇文泰，便能以此「從民望」、「服雄傑」、「致英俊」，在建政初期站穩腳步，打下與東魏長期鼎峙的基礎。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君臣大義、東西魏

* 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指導。匿名審查人不僅細心指導本文，提出前瞻性的建議，更給予充分的體諒與包容，但文中有任何的錯誤仍由筆者負責。

** 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員。
聯絡信箱：ani65738@gmail.com

一、前言

孝武帝西入關中使北魏分為東西，是北朝末劃時代的一件大事。眾所周知，西魏初期國力遠遜於東魏，卻能與其長期對峙，奠定往後北周滅北齊基礎。陳寅恪先生(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陳寅恪，其他人名亦同)曾提出「關中本位政策」解釋箇中原因，此說至今仍是學界定論，影響深遠。

陳寅恪「關中本位政策」說發想於高歡與杜弼的一番言論，《北齊書·杜弼傳》載：

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宇文泰)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¹

陳寅恪由此得出：

觀高歡之用心，則知當日分爭鼎立之情勢，不能不有維繫人心之政策矣。……關隴之地則財富文化兩俱不如(東魏、梁)，若勉強追隨，將愈相形見拙，……(宇文泰)遂毅然決然捨棄摹仿不能及之漢魏以來江左、山東之文化，而上擬周官之古制。²

陳寅恪擅長捕捉歷史氛圍，進而勾勒龐大歷史架構，卓越史識至今無人能出其右。但「關中本位政策」說仍留下一些可資補充的空間，如宇文泰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來維繫西魏人心，那除財富、文化外，高歡又是以何種方式穩定東魏「去留未定」的人心呢？高歡與杜弼之言也有深究的必要，何德章即以為：

考諸史實，六鎮餘眾多在高歡麾下，宇文泰所統「軍士多是關西之人」。高歡：「督將家屬多在關西」於史無證。而其時中原士大夫雖不少人模仿南方文人的詩文乃至剽竊，但早已不「以江東為正朔所在」。³

¹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點校本)，卷24，〈杜弼傳〉，頁347-348。

²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02；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點校本)，卷157，頁4881。

³ 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武漢，2001)，頁60。

如果東魏督將家屬多不在關西，中原士大夫亦早不以江東為正朔所在，那東魏「人情去留未定」應有其他因素，且據史載與前人研究(請參附表1「關中本位政策」推行歷程表)，西魏開始推行「關中本位政策」是在大統八年(542)，⁴正式完成要到恭帝三年(557)，那麼弱小的西魏在建政初期必有其他特質，得以與強大的東魏周旋。

唐長孺觀察到六鎮鎮民內部的階層分化，認為：「當豪強武裝和政府軍為起義軍擊潰後，這些人物先後集中到契胡酋長尔朱榮的麾下。尔朱榮用以鎮壓各地起義軍的統兵官基本上就是這批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鎮民內部的階級貫徹始終，鎮民絕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⁵並進一步申論：

階級矛盾是對抗性的，哪怕當時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族內的階級矛盾也還是不可調和，鬥爭也遠不是停止，只不過通常以反魏與擁魏的面貌出現。⁶

何德章對北魏末群雄「擁魏」有更深入的闡述：

北魏末年政治動盪一波接著一波，……然而在政治動盪的過程中，卻有一種隱隱存在的力量在支配各種活躍的政治勢力。這種力量正是我們前文論述過的確立孝文帝的「國統」，進而維護魏的法統的支持者，正視這一力量並加以利用的政治勢力會獲得一定的成功，如果某種政治勢力忽視這一力量或者

⁴ 初期府兵制成立時間有大統三年(537)十二軍出現、大統八年(542)六軍成立、大統十六年(550)八柱國登場三說。唐長孺主張大統十六年(550)說，並以宇文泰在西魏成立前即分其軍為十二，否定大統三年(537)說，但也指出「六軍者，天子之軍，這裡暗示宇文泰將關西大行臺提升到六軍的地位，使軍隊就只有一個系統。」因此初期府兵制的雛形當成於大統八年(542)六軍出現時。毛漢光以為「這個制度(府兵制)之成立，並非一張白紙黑字公告即可以出現，在此之前有一段醞釀期，所以大統三年(537)、大統六年(540)、八年(542)、九年(543)，甚至於西魏小朝廷甫成立時之大統元年(535)，都是府兵制度步步走向成立的重要階段。」然而宇文泰在孝武帝入關前就將其軍分為十二，若依毛說，則早於西魏建立前，宇文泰即有筹建府兵制之構想，那他又如何能預知孝武帝「必將」且「順利」入關，並為團結西魏胡漢人心預先推行外抗北齊、梁的「關中本位政策」呢？可知毛說推測成分居多，府兵制成立的最早時間仍應以其組織初步出現之時為準。唐長孺之論，請參唐長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51-254。毛漢光之說，請參毛漢光，〈西魏府兵史論〉，《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267。

⁵ 唐長孺，〈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61。

⁶ 唐長孺，〈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義〉，《山居存稿》，頁80。

公然與之對抗，結果只能以失敗告終。北魏末年的黃河流域可謂「人心向魏」，一如東漢末「人心向漢」，已不在是西晉滅亡後那樣，容許各種政治力量盡情表現自己，歷史已進入有序發展的階段，有了發展的主線。⁷

往後即使這些政治勢力掌握政權，仍不敢改變擁魏立場，呂春盛對此有如下分析：

高歡與宇文泰雖然實際掌握東西魏的實權，但雙方皆不願竄改國號，始終保留北魏原有之國號，聲稱己方才是北魏王朝的正統繼承者，這顯示經過百餘年統治之後，北魏王朝已建立相當程度的權威，高歡和宇文泰都認為北魏這塊招牌尚有號召的力量，因而不敢妄加竄改。⁸

但唐長孺的六鎮豪強「擁魏」說、何德章的「人心向魏」說及呂春盛的「北魏王朝權威」說卻與傳統觀點大不相同，葉適以為：

尔朱榮以部落酋長，居秀容不毛，地只一縣，眾才數千，世為邊藩，朝權輕重，曾莫之預；一旦稱兵，沉太后幼主，獵舉國士如狐兔，散葛榮百萬，擒蕭寶寅、万俟醜奴，天下大難略盡，雖身不終，而魏竟以亡。然則權與力皆不足而若是，何也？孝文藉累世富盛，志慕古人，解縱維索，護齊癰疽，既無回幹風俗之功，反受動搖根本之害，榮之禍實自取之，悲夫！⁹

王夫之亦曰：

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由來漸矣。自遷洛以來，塗飾虛偽，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縻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強宗大族，以侈相向，而上莫之懲，於是精悍之氣消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群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為，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¹⁰

陳寅恪在葉適、王夫之的立論上進一步發揮：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

⁷ 何德章，〈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頁57。

⁸ 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0），頁355-356。

⁹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點校本），卷34，「魏書·尔朱榮傳」條，頁506。

¹⁰ 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卷17，「梁武帝」條，頁576。

而逐漸腐化矣。然同時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而不為洛都漢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疆六鎮胡化民族對漢化之反動亦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尙朱部落乘機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十三日河陰之大屠殺，遂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對漢化之公開表示，亦中古史劃分時期之重要事變也。¹¹

周建江論孝文帝改革亦以為：

孝文帝雖然在形式上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但對漢文化的精髓沒有深刻的瞭解、明確的認識，所以孝文帝的漢制變革既放棄了本民族的思想基礎，又沒能建立起支撐其政治的新思想、新文化，邯鄲學步，結果只能自取滅亡。¹² 葉適等人將北魏滅亡之因歸諸於孝文帝漢化改革，所見誠然精準，然而卻與北魏末時人的認知不同。孝文帝在世時，崔僧淵就說他：「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¹³ 孝文帝過世後，時人對他的推崇更臻極致。李彪稱讚孝文帝：「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¹⁴ 張彝也說孝文帝：「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¹⁵ 辛雄亦以為孝文帝「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¹⁶ 元彧也稱孝文帝：「德溢寰中，道超無外。」¹⁷ 高歡亦高度推崇孝文帝，他在孝武帝西奔後稱：

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孝莊帝)以孝文為伯考，永熙(孝武帝)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¹⁸

〈遷都詔書〉亦云：

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惟新。¹⁹

¹¹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97。

¹²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變革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134。

¹³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24，〈崔僧淵傳〉，頁631-632。

¹⁴ 魏收，《魏書》，卷62，〈李彪傳〉，頁1396。

¹⁵ 魏收，《魏書》，卷64，〈張彝傳〉，頁1431。

¹⁶ 魏收，《魏書》，卷77，〈辛雄傳〉，頁1695。

¹⁷ 魏收，《魏書》，卷18，〈元彧傳〉，頁421。

¹⁸ 李百藥，《北齊書》，卷2，〈神武紀〉，頁18。

¹⁹ 魏收，《魏書》，卷12，〈孝靜紀〉，頁297。

魏收也說孝文帝：

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²⁰

魏收在解釋北魏衰亡之因時亦稱：

世宗(宣武帝)承聖考(孝文帝)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

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²¹

可知北魏末時人並不認為漢化政策造成北魏動亂，反而視孝文帝時代為盛世，緬懷不已，這正是「人心向魏」的背景。唐長孺等學者顯然開拓出新的研究取向，然而他們並未注意到東西魏在建政初期各自面臨的問題；何德章雖指出時人對孝文帝「國統」的認同，但時人對孝文帝一系的仰慕是在高度重視君臣一倫語境下展現的，此即「君臣大義」。

甘懷真曾為文討論中古時期的君臣關係，他以為「君臣大義」出自「君臣義合」，最早可推至東漢《白虎通》以此解釋確立君臣關係的「委質策名」儀式，但皇帝不可能透過此一儀式與所有臣僚建立君臣關係，故發展出「忠孝同質說」：

政治世界的原理是家內秩序原理的同質性延伸，君臣關係同於父子關係，故

孝可以移為忠。

即使如此，還是會遇到忠、孝產生矛盾的情況，因此出現了若在國為國臣，必須義斷父子私恩；若在家為孝子，必須以父子之情斷君臣之義的「忠孝並序說」。²²甘先生立論宏觀，卻也因而較少論及北魏末「君臣大義」之樣態。

就史籍所載，在東、西魏分立時，常見以「君臣大義」為抉擇依據者，如裴寬就以：

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

不願出仕東魏，往後隨獨孤信入關。²³亦有犧牲個人家族私利追尋「君臣大義」者，如裴俠、獨孤信、賀拔勝就捨棄家人入西魏。更有人將「君臣大義」

²⁰ 魏收，《魏書》，卷7，〈高祖紀〉，頁187。

²¹ 魏收，《魏書》，卷8，〈世宗紀〉，頁215。

²²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的君臣關係〉，《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129、136-141。

²³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點校本），卷34，〈裴寬傳〉，頁594-596。

的價值極度演繹，如高歡在晉陽誓師時便稱：

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孝武帝)，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²⁴

高歡將「君臣大義」提高到能貫通天地人神的地步，除強調自身反尔朱氏的歷史外，也是為「清君測」之舉尋求正當性。不僅高歡，尔朱榮、宇文泰亦高舉「君臣大義」旗幟為行動尋求正當性，而深獲人心，成就霸業，但學界對這觀念在北魏末、東西魏政治發展產生的作用卻甚少留意，便值得進行深入探討。

在展開全文論述前，史料批判無疑是必要的第一步。本文所能依據的第一手史料主要是《周書》、《北齊書》、《北史》，但早在唐代，劉知幾就指出《周書》有許多改寫、潤飾甚至回避的現象；又有「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的編纂原則，致使「事有不同，言多爽實。」²⁵而《北齊書》到北宋時僅有十七卷為李百藥原文，其餘三十三卷據唐長孺之說大多是後人以《北史》、《高氏小史》增補，「就其存者，大抵詳於《北史》」，然而也有「多文飾」的缺失。²⁶至於《北史》，據唐長孺的研究是在刪減《北齊書》、《周書》的基礎上參考王劼《齊志》等史書增補而成。²⁷此外，據高敏的研究，李延壽是乃為振興家族而私下修史，並站在北朝正統立場書寫，具有美化李唐政權的意涵，書成後因此受到唐高宗重視特別作序褒揚，²⁸可見《北史》的編撰亦難脫政治因素考量。

三書皆成於唐初，唐又沿襲西魏、北周、隋一系，因此三書所載是否客觀、不悖事實仍有辯證餘地，尤其本文論證主要依據的《周書》又常以「起義」或「立義」等堂皇言辭來形容歸附西魏者的理由，但從附表 2：東魏初年歸附西魏人士表中可知，多數人是在東魏於大統三年(537)沙苑大敗後才投奔西魏，可見他們不過乘西魏勝利之勢，雖以「君臣大義」為舉兵之由，只

²⁴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6，〈齊神武紀〉，頁222。

²⁵ 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144。

²⁶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9-60。

²⁷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頁63。

²⁸ 高敏，《南北史考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4-5。

是將此作為美化自身行徑的藉口，也能由此推演出尔朱榮、高歡、宇文泰等霸主高舉「君臣大義」而「擁魏」只是牟取政治利益的粉飾。然而即使群雄或地方勢力將「君臣大義」當作工具，但從他們仍須高舉此旗幟使世人支持其行動，也證實這一觀念對時人的偌大號召，鄭偉便是很好的例子。當裴俠決意捨棄妻子隨孝武帝入關時，鄭偉對他說：「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²⁹隨之回鄉，不求仕進。要到西魏沙苑大捷，諸勢力紛紛歸順時，鄭偉才以「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宜以此時効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舉兵。可知，鄭偉並非真心效忠西魏，但從他以「君臣大義」起兵，轉瞬間竟有萬餘人響應來看，所為當獲時人認同。³⁰這正是本文所欲捕捉的重點。

《資治通鑑》雖成於北宋，但所載北朝末史事卻多有超出三書者，據唐長孺的考證《資治通鑑》所引諸書：

南北朝事則《高氏小史》、裴子野《宋略》、《南北史》、《十六國春秋》、《十六國春秋鈔》、元行沖《後魏國典》、沈約《齊記》、楊杵《談藪》、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丘悅《三國典略》(梁以後多引此書)、蕭韶《太清紀》(侯景事多引此書)、《國典》。徵引所及，正史以外，唯此數種，則宋時文獻已極缺略可知。而於此數書，凡足資考證異同者，幾於一字一句莫不比對，其不苟如此。……《通鑑》參考諸書不必皆著於考異，其有無他異聞，不須考證者皆直收入正文。……《通鑑》此段(南北朝史事)雖多出正史，然考校之功多，而所引異說又多是佚書，治魏晉南北朝史者不可忽也。³¹

可知《資治通鑑》所載正史外史料不僅彌足珍貴，有些更經嚴謹考證比對才列入內文，本文亦多徵引，以補三書之不足。

本文擬以「君臣大義」為主軸，探討北魏末人心歸向對政局產生的影響、群雄對「挾天子」的認知、宇文泰為孝武帝入關所做的佈局、「挾天子」在西魏對抗東魏、宇文泰鞏固權力發揮的作用、高歡為團結東魏人心所付出的努力，鋪陳出北魏正統攸屬對東、西魏產生的影響，以作為「關中本位政策」

²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35，〈裴俠傳〉，頁618。

³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36，〈鄭偉傳〉，頁634。

³¹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頁63。

說之補充。

二、「君臣大義」與北魏末政局

(一) 尔朱榮、高歡的崛起：

六鎮亂後，北魏王朝不僅為應付群起的叛亂疲於奔命，內部亦陷入孝明帝與胡太后的權力糾葛中。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王朝已岌岌可危，時人對此有很清楚的認知。如高歡就對尔朱榮說：「方今天子(孝明帝)愚弱，太后(胡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³²然而，尔朱榮在毫無名義的情況下，逕自舉兵「清帝側」實與叛逆無異。賀拔岳的建議補足了高歡之說的不足，他對尔朱榮說：「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任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主，何往而不克，何向而不摧。」³³可見尔朱榮必須高舉「義旗」才能獲取人心，順利入洛。那麼尔朱榮入洛高舉的「大義」是什麼呢？

孝明帝死後，尔朱榮在上表中要求朝廷：「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認定孝明帝之死與徐紇、鄭儼有關，欲誅之以謝天下；而徐紇、鄭儼是胡太后的寵臣，因此問罪徐、鄭二人即蘊含聲討胡太后弑君的用意，可見這就是尔朱榮入京所依恃的「大義」。³⁴

尔朱榮高舉的「大義」深得群臣支持，當他們得知尔朱榮擁立元子攸為君後，即「奉璽紱，備法駕」至河陰迎接。³⁵在此鼓舞下，尔朱榮不顧胡太后「多所陳說」，沉其與幼帝於河，³⁶為孝明帝復仇，這時尔朱榮入洛前標榜的

³²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1。

³³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岳傳〉，頁221。

³⁴ 魏收，《魏書》，卷74，〈尔朱榮傳〉，頁1647。

³⁵ 魏收，《魏書》，卷10，〈孝莊紀〉，頁255。關於河陰之變的詳細討論請參胡勝源，〈河陰之變新探：以尔朱榮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8期(臺北，2012.11)，頁9-10。

³⁶ 魏收，《魏書》，卷13，〈宣武靈皇后胡氏傳〉，頁340。

「大義」已完全實現。如果沒有發生河陰之變，尔朱榮在北魏歷史上的地位便會如元天穆所說：「伊、霍復見於今日」。³⁷

魏收在《尔朱榮傳》末的〈史臣曰〉也用了元天穆的說法：「向使(尔朱)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³⁸也肯定尔朱榮入洛之舉，認為：「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³⁹所謂的「桓文之舉」即是春秋時代齊桓公、晉文公的「尊王攘夷」，亦是高歡所說的「霸業」、賀拔岳所說的「非常之事」。尔朱榮如唐長孺所說是「北鎮豪強的頭子」；⁴⁰旗下的高歡是懷朔豪強的領袖，賀拔岳則是武川豪強的核心，他們對時局的認知與羣臣完全一致，都認為要行「桓文之舉」才能挽救北魏「上下離心，文武解體」的局面。但「尊王攘夷」乃春秋時代王權陵夷情形下諸侯霸者為維持封建秩序揭橥的旗幟，與帝制國家並不類似，再從效尔朱榮模式稱霸的高歡、宇文泰兩人之子皆代魏建立新朝來看，似乎能認定高歡、賀拔岳此時出謀策劃是為尔朱榮往後篡位鋪路，但從往後發展來看卻非如此。因河陰之變後，尔朱榮意圖移鼎，高歡反對，「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⁴¹賀拔岳亦以為不可曰：「將軍首舉義兵，共除姦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⁴²河陰變後，北魏朝廷已無力量抵抗尔朱氏，此時正是尔朱榮篡位的最佳時機，勸尔朱榮舉兵以成「桓文舉」的高歡、賀拔岳卻對此事不以為然，可知他們此前乃順應時代對強臣的呼喚提出建言，未慮及易代之事。

尔朱榮不久後被孝莊帝所殺，其侄尔朱兆為報仇，曾召喚時任晉州刺史的高歡同行，卻被其所拒，後挾持孝莊帝赴晉陽。高歡「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尔朱)兆，因密覘孝莊(帝)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⁴³高歡當視孝莊帝被俘為成就霸業的良機，這與他之前對尔朱榮建言的思路一致，這從高歡

³⁷ 楊銓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1，「永寧寺」條，頁30。

³⁸ 魏收，《魏書》，卷74，〈尔朱榮傳〉，頁1657。

³⁹ 魏收，《魏書》，卷74，〈尔朱榮傳〉，頁1657。

⁴⁰ 唐長孺，《山居存稿》，頁56。

⁴¹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1。

⁴²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岳傳〉，頁222。

⁴³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2。

往後與高乾兄弟、封隆之的合作也可略窺端倪。

孝莊帝未登基前即與高乾關係密切，河陰之變後高乾回鄉起事，孝莊帝下詔招撫，高乾兄弟隨即出降。尔朱兆入洛不久即弑孝莊帝，高乾兄弟在得知孝莊帝的死訊後，在冀州「為莊帝舉哀，三軍縞素」、「升壇誓眾，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劉靈助節度。⁴⁴劉靈助是尔朱榮深信的占卜師，在尔朱榮欲篡位時，他藉鑄金人不成的機會，力勸尔朱榮再次迎奉孝莊帝。⁴⁵劉靈助在孝莊帝死後，自號燕王，聲稱為孝莊帝復仇、「舉義兵」。⁴⁶因此高乾北受劉靈助節度，即是加入為孝莊帝復仇的反尔朱氏陣營。

當高歡率眾東出，聲言欲討伐高乾等人時，高乾卻認為高歡可以合作，對部下說：「尔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効義(《北史·高乾傳》作：「効節」)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⁴⁷「効義」即是「建義」，高乾認定高歡是英雄，必定不會錯過舉「大義」討伐尔朱氏的良機；若從《北史·高乾傳》的「効節」，則不啻是認定高歡會忠於魏室。往後與高歡見面時，也說他因「忠」或「義」而「威德素著，天下傾心」，⁴⁸憑此尔朱氏黨羽即非對手。⁴⁹

高歡會改變原本效忠尔朱氏的立場，與忠於魏室的高乾兄弟合作，當是體察時人對尔朱氏的強烈不滿。當時不僅劉靈助、高乾兄弟、封隆之起事，范陽盧氏出身的盧文偉也與劉靈助一同舉兵，劉靈助死後則回本郡與高乾兄弟「共相影響」。⁵⁰隴西辛氏出身的辛慶之，聽聞孝莊帝的死訊便「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⁵¹

不只山東豪強，尔朱氏旗下成員對尔朱氏亦是貌合神離。如尔朱榮的舊部樊子鵠，尔朱世隆反攻洛陽時曾召他前來，樊子鵠不從，因此得到孝莊帝

⁴⁴ 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乾傳〉，頁290。

⁴⁵ 李延壽，《北史》，卷48，〈尔朱榮傳〉，頁1754。

⁴⁶ 魏收，《魏書》，卷91，〈劉靈助傳〉，頁1959。

⁴⁷ 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乾傳〉，頁290-291；李延壽，《北史》，卷31，〈高乾傳〉，頁1142。

⁴⁸ 李延壽，《北史》，卷31，〈高乾傳〉，頁1142。

⁴⁹ 與高乾兄弟起兵的還有封隆之，他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請參李百藥，《北齊書》，卷21，〈封隆之傳〉，頁301。

⁵⁰ 李百藥，《北齊書》，卷22，〈盧文偉傳〉，頁320。

⁵¹ 令狐德棻，《周書》，卷39，〈辛慶之傳〉，頁697。

的讚賞，任命他為豫州刺史。尔朱兆入洛後責備樊子鵠有「乖異之意」，奪其部眾。⁵²「委質」事尔朱榮的賀拔勝，在尔朱榮死後以「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孝莊)帝。」往後在尔朱兆要殺他時也說：「天柱(尔朱榮)被戮，以君誅臣，(賀拔)勝寧負王，不負朝廷。」往後更與斛斯椿以「天下皆怨毒尔朱」合謀誅殺尔朱氏。⁵³

高歡與斛斯椿、賀拔勝都是尔朱榮的舊部，他將弑君的尔朱兆視為「逆胡」並稱其所為「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與斛斯椿「天下皆怨毒尔朱」的時局認識也是一致的。與斛斯椿等人不同的是，高歡從尔朱兆手上取得十餘萬的六鎮之眾，隨後就食山東，與忠於魏室的高乾等合作，舉義旗脫離尔朱氏。⁵⁴

高歡舉義後擁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⁵⁵也因此高歡不能如尔朱榮一般以「清君側」作為討伐亂臣的「大義」。高歡便在韓陵戰前，當眾指責尔朱兆弑君，將此戰定義為孝莊帝復仇之戰；又對尔朱兆說「今日義絕矣」。「義絕」中的「義」指的是高歡與尔朱兆的結拜兄弟之義，「義絕」就是斷絕兄弟之義的意思。正因斷絕「兄弟私義」，高歡便能高舉「君臣大義」，賦予這場戰爭神聖的意義。往後孝武帝即位後下的第一道詔書，即明白宣示高歡是為報孝莊帝被殺的「國恥」而「舉義旗」。也因高歡高舉為孝莊帝報仇的「大義」旗幟，斛斯椿便以尔朱氏「亡無日矣」起心背叛；關中的賀拔岳也認定尔朱氏「必敗」，在韓陵戰後與侯莫陳悅合謀突襲尔朱天光，響應高歡的舉義。⁵⁶

舉義讓高歡深得人心打敗尔朱氏，不僅高歡本人被比擬為齊桓公、晉文

⁵² 魏收，《魏書》，卷80，〈樊子鵠傳〉，頁1778。

⁵³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辛慶之傳〉，頁217。

⁵⁴ 長部悅宏認為尔朱榮軍閥集團是採用以尔朱榮為領袖，尊奉孝莊帝的尊皇體制，以此產生集團的向心力，集團內部的秩序最安定。因此當尔朱榮被孝莊帝所殺後，集團內部才會分裂成支持孝莊帝與支持尔朱氏兩股勢力。長部氏的觀點，請參長部悅宏，〈北魏孝莊帝代尔朱氏軍閥集團再論(3)：王都——霸府體制を焦點にして〉，《地理歴史人類学論集》(沖繩，2010)，頁24-31。

⁵⁵ 李百藥，《北齊書》，卷18，〈孫騰傳〉，頁234。

⁵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3。

公，⁵⁷他舉兵信都一事在北魏、東魏的官方文書上更被稱作「建義」或「舉義」，參與起事的人也被稱為「義旗」，「義旗」的地位崇高，《北齊書·高昂傳》載：

自(高)昂初以豪俠立名，為之羽翼者，呼延族……；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並仕宦顯達。孟和名協，……以建義勳，賜爵長廣縣伯。⁵⁸

高昂、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人有「建義勳」，是因他們與高歡共同「建義於信都」，故在北魏、東魏皆「仕宦顯達」，被稱為「勳貴」。往後高歡在與孝武帝兵戎相見前亦重複了兩次「大義」，將之與前述「勳貴」在北魏、東魏政界的飛黃騰達相聯繫，便能看出高歡對自身「建義」歷史的重視。

(二)賀拔岳的野心

建政伊始，高歡與孝武帝的關係卻急遽惡化。關中的賀拔岳本欲應高歡徵召入朝，薛孝通力阻，指出當時君相間存在矛盾，更說：

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繫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城雉，因黃河而為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⁵⁹

宇文泰此時也為賀拔岳出謀策劃，《周書·文帝紀上》載：

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解)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

薛孝通出身河東薛氏，卻與出身六鎮的宇文泰有大致相同的時局觀察。他對高歡困境理解異常精準，不久洛陽與晉陽便陷入尖銳的對立中。然而他對關中形勢的判斷則流於空泛，遠不及宇文泰所論深刻。更重要的是薛孝通只看到賀拔岳能以關中的地理、人才優勢自據一方，宇文泰卻明確指出賀拔岳的

⁵⁷ 魏收，《魏書》，卷11，〈出帝紀〉，頁291。

⁵⁸ 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昂傳〉，頁299。

⁵⁹ 李延壽，《北史》，卷36，〈薛孝通傳〉，頁1336。

內在威脅，並揭示還軍長安後要以「匡輔魏室」作為關西的「大義」，如此便能成就「桓文舉」，這無疑擊劃了賀拔岳的錦繡前程，也難怪賀拔岳會為之「大悅」了。⁶⁰

值得注意的是，薛孝通會向賀拔岳提出建言，是因高歡以孝武帝名義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之故，⁶¹由此便可看出高歡「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力量之大。往後孝武帝與高歡不睦，便給賀拔岳「挾天子」的機會，隨即派周惠達前去洛陽，陳述他對朝廷的忠誠。周惠達返關中覆命，賀拔岳也跟他說：「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⁶²「憂其禍難」正是孝武帝嘉勉賀拔岳的原因，因而在賀拔岳死後，宇文泰寫給侯莫陳悅的信中才會說：

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孝武帝)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賀拔岳)

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⁶³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賀拔岳派宇文泰去晉陽「觀(高)歡之為人」，而從宇文泰回長安後建議賀拔岳「還軍長安，匡輔魏室」來看，其意當是在安定關中內部後進軍洛陽。因此當宇文泰去洛陽向孝武帝「密陳其狀」時，孝武帝會「深納之」，隨即任命賀拔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密令(賀拔)岳圖齊神武(高歡)」更賜與心前血，宣示結盟的決心。⁶⁴

但《北史·雷紹傳》卻說，賀拔岳此後不久「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⁶⁵此說卻經不起驗證。《北史·雷紹傳》說賀拔岳不用雷紹「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的計策後，即命雷紹為京兆太守，雷紹「在郡逾年，岳被害。」⁶⁶賀拔岳被侯莫陳悅所殺是在永熙三年(534)正月，⁶⁷因此賀拔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的時間必在永熙二年(533)正月前，而正是在永熙二年(533)

⁶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3-4；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6，頁4834。

⁶¹ 李延壽，《北史》，卷36，〈薛孝通傳〉，頁1336。

⁶² 令狐德棻，《周書》，卷22，〈周惠達傳〉，頁362。

⁶³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7。

⁶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岳傳〉，頁225。

⁶⁵ 李延壽，《北史》，卷49，〈雷紹傳〉，頁1807。

⁶⁶ 李延壽，《北史》，卷49，〈雷紹傳〉，頁1807。

⁶⁷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4。

正月後賀拔岳接受宇文泰的建言，欲成「桓文舉」。《北史·雷紹傳》的說法明顯有誤，《資治通鑑》便不取此說而從《周書·賀拔岳傳》之載，認為賀拔岳採宇文泰「匡輔魏室」之策，派其入洛，宣示對孝武帝的忠誠。⁶⁸

賀拔岳隨即討伐不歸附的曹泥，卻被意圖獨佔關中的侯莫陳悅所殺。賀拔岳餘部在趙貴的提議下推奉宇文泰統軍，賀拔岳的未竟之業，便交由宇文泰完成。

三、「君臣大義」與西魏政權的建立

(一)「君臣大義」與宇文泰的崛起

宇文泰前往平涼總軍前，心腹夏州長史于謹對他說：

關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且天子(孝武帝)在洛，逼迫群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帝(孝武帝)必嘉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⁶⁹

于謹之論不但結合了薛孝通、宇文泰之策，更明確提出「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的手段以及「桓、文之業」的終極戰略目標，見識超越前人之上，無怪乎宇文泰會聞之「大悅」。⁷⁰

「挾天子而令諸侯」最早可溯源至毛玠對曹操的建言：

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⁷¹

毛玠建言中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與「挾天子而令諸侯」大意基本一致；而「霸王之業」即于謹所言「桓、文之業」。可知，毛玠之議即是于謹建言的藍本。

值得注意的是，毛玠勸曹操迎奉漢獻帝的理由是「兵義者勝」，這裡的

⁶⁸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6，頁4834-4835。

⁶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15，〈于謹傳〉，頁245-246。

⁷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5，〈于謹傳〉，頁245-246。

⁷¹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卷12，〈毛玠傳〉，頁374-375。

「義」指的正是「君臣大義」，往後荀彧對此有更深入的闡述：

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今車駕(漢獻帝)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
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
大德也。⁷²

「挾天子」不僅能讓「諸侯景從」更能使「天下歸心」，進而「從民望」、「服雄傑」、「致英俊」，曹操往後能建立霸業實奠基於此。

不僅曹操，尔朱榮能順利進入洛陽，正因他「挾天子」之故。魏收說當時人心「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也是將尔朱榮的霸業與齊桓公、晉文公相提並論。高歡的路線也與尔朱榮一致，孝武帝西奔，元亶在「承制總萬機」時所下的制書中也說高歡「位居晉鄭，任屬桓文。」⁷³從而宇文泰以「桓文舉」描繪賀拔岳的遠景，與于謹以「桓、文之業」為宇文泰規劃前程並非偶然，乃是如魏收所說是時人的共識。故胡寅會說：「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⁷⁴

其實賀拔勝此時也有機會「挾天子而令諸侯」，當孝武帝召他引兵入洛時，盧柔提出三策，分別是：「席捲赴都，與(高歡)決勝負，存沒以之」的忠之上策、「帶甲十萬，觀釁而動」的中策與「舉三荊之地，通款梁國」的下策。⁷⁵孝武帝西遷後，崔謙也對賀拔勝說：「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眾，若杖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激。……則桓、文之勳，復興於茲日矣。」⁷⁶崔謙的建議，就是盧柔的忠之上策，「桓、文之勳」便是于謹的「桓、文之業」。但賀拔勝在盧柔的三策中選擇中策「觀釁而動」，結果就是「人皆解體，士各有心」⁷⁷遂為侯景所敗而奔梁。

與賀拔勝的猶豫相比，宇文泰更能把握建立「桓、文之業」的機會，實

⁷² 陳壽，《三國志》，卷10，〈荀彧傳〉，頁310。

⁷³ 魏收，《魏書》，卷11，〈出帝紀〉，頁291。

⁷⁴ 胡寅，《讀史管見》(長沙：岳麓書社，2011)，卷13，「論魏孝武不足恤」條，頁476。

⁷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32，〈盧柔傳〉，頁562。

⁷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35，〈崔謙傳〉，頁612。

⁷⁷ 令狐德棻，《周書》，卷32，〈盧柔傳〉，頁562。

踐于謹之策。但在賀拔岳死後，諸將本欲推「年最長」的寇洛總兵事，是寇洛推辭，且在「欲糾合同盟，復讎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的考慮下才將資淺的宇文泰列為考慮人選，⁷⁸即使如此，諸將依然「猶豫未決」，仍有請賀拔勝入關主持大局以及東告朝廷兩種意見，是赫連達認為二者皆「遠水不救近火」，諸將才決定迎宇文泰入平涼。

據《周書》各人本傳，一開始即主張由宇文泰統軍的人只有趙貴與赫連達兩人，⁷⁹經赫連達一番陳說後才支持宇文泰統軍的將領有寇洛、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達奚武、庫狄昌、梁臺、趙善、呂思禮、雷紹等人，⁸⁰李虎在史籍中無傳，《冊府元龜·帝王部》說他在賀拔岳死後「陰懷復讎之志」奔赴荊州，遊說賀拔勝掌軍，⁸¹立場顯然也與寇洛等人相同；而梁禦「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為恨，言不及家」，可能也是欲請賀拔勝入關或東告朝廷者。從而，即使宇文泰被擁立為諸將之首，他的領導地位依然不甚穩固，決策時仍需考慮寇洛以下諸將的態度。

寇洛等人會想請賀拔勝入關指揮是因其為賀拔岳之兄，乃是武川豪強位望最高者；而欲東告朝廷則顯示在他們心中，北魏朝廷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其實賀拔勝也是忠於魏帝者，孝武帝即位後任命他為領軍將軍，不久改任侍中，此二職都是皇帝心腹之位。接著「以(賀拔)勝弟(賀拔)岳擁眾關西，欲廣其勢援」，更任命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加南道大行臺。⁸²高乾以為孝武帝此舉「外示疏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⁸³孝武帝親信斛斯椿也對張軌說：「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泰)何如賀拔(岳)也？」⁸⁴可見在時人的眼中，賀拔勝與賀拔岳都是孝武帝之黨，不論兩人何者統領關中軍，這支軍隊都與孝武帝脫不了關係，若以荊州刺史賀拔勝兼統賀拔岳餘部，則更是將孝武帝苦心佈局欲使之相近的荊州、關中兩

⁷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4-5。

⁷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27，〈赫連達傳〉，頁439。

⁸⁰ 請參《周書》、《北史》各人本傳。

⁸¹ 王欽若，《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卷1，〈帝王部〉，頁13。

⁸²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勝傳〉，頁218。

⁸³ 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乾傳〉，頁291。

⁸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37，〈張軌傳〉，頁664。

大軍事勢力融為一爐。因此寇洛等人欲以賀拔勝總軍或東告朝廷實為一事，只不過東告朝廷則是更加確認孝武帝的意向而已。⁸⁵

因此，宇文泰所統領的其實是忠於孝武帝的軍隊，宇文泰若要穩固地位，勢必尊奉孝武帝的意志。但孝武帝在得知賀拔岳的死訊後，隨即派武衛將軍元毗入關「宣旨慰勞，追(賀拔)岳軍還洛陽」，同時亦下敕令追還侯莫陳悅。從宇文泰上表：「臣以大有既班，忍抑私憾」，⁸⁶可知，孝武帝曾赦免侯莫陳悅之罪，試圖凝聚反高歡的勢力。但宇文泰若奉旨率軍入洛，除將關中拱手讓與侯莫陳悅外，孝武帝更能親自指揮此一親魏部隊，如此宇文泰就真的只能「權掌兵事」，遑論成就「桓文之業」了。宇文泰隨之上表孝武帝，以高歡、侯莫陳悅威脅為由推遲東下。⁸⁷但為安撫北魏朝廷與親魏將領，宇文泰便與元毗、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⁸⁸

不久孝武帝下詔任命宇文泰為大都督，仍要他即刻率軍入京，並說「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⁸⁹宇文泰緊抓此點，上表稱：

(侯莫陳)悅並維繫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指趣，勢必異圖。⁹⁰

侯莫陳悅自暗殺賀拔岳後即「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更依附高歡不肯奉詔。⁹¹這次又「不聽反報」便給宇文泰視為「逆臣」，依「君臣大義」加以討伐的藉口。宇文泰在初上表時即稱侯莫陳悅為「國之大賊」。⁹²攻克原州後更在上表說：「(侯莫陳)悅外附強臣(高歡)，內違朝旨。」進而以「逐惡」、「為國除害」來合理己身遲不奉詔東下的行徑。⁹³

宇文泰能順利擊敗侯莫陳悅，關鍵是得到李賢、李遠兄弟的支持，使其

⁸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27，〈赫連達傳〉，頁439。

⁸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6-7。

⁸⁷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6。

⁸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6。

⁸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6。

⁹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6-7。

⁹¹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5。

⁹²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4-5。

⁹³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8。

得到戰略前哨站原州。⁹⁴李賢兄弟會投向宇文泰則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有關。之前六鎮亂民侵逼原州時，李賢兄弟即不屈服。李遠還跟鄉人說此時「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帥眾「深壁自守」；⁹⁵宇文泰高舉「為國除害」的「君臣大義」攻打侯莫陳悅，應對獲得李賢兄弟的協助有相當的幫助。

(二)孝武帝西入關中的背景

宇文泰打敗侯莫陳悅後，孝武帝、高歡對他爭相拉攏。宇文泰明確拒絕高歡的厚禮，並依孝武帝的指示派軍入黃河、渭水合口，表明效忠皇帝的堅定立場。孝武帝則報以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的高位。⁹⁶此時皇帝仍在洛陽，從高歡大軍逼近洛陽時，除了西就關中外，羣臣也有奔梁、南依賀拔勝、守洛口死戰等建議，⁹⁷可見關中並非孝武帝唯一選項，宇文泰還須多方用心，利用「忠君」的名聲吸引孝武帝入關，才能完成「挾天子而令諸侯」的終極目標。

于謹在向宇文泰獻策後不久，便被孝武帝徵為閣內大都督，那時即「進都關中之策」，孝武帝「納之」，顯然已將入關列為選項。宇文泰平侯莫陳悅後派帳內都督楊薦入京請事；而楊薦往後也贊成孝武帝入關之計，可知他應曾勸孝武帝遷都關西；⁹⁸宇文泰並命都督張軌入洛見斛斯椿，張軌在斛斯椿面前大贊宇文泰「文足經國，武可定亂」更說他「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宇文泰殺侯莫陳悅，成功為賀拔岳報仇，張軌所言對斛斯椿便很有說服力，他才會說出宇文泰「真可恃也」這樣的話。⁹⁹斛斯椿是孝武帝的心腹，這對往後孝武帝的動向必定產生影響。

除了宇文泰連番派人入洛勸說外，側近的態度亦對孝武帝發揮作用。隨著高歡佈置在洛陽的心腹一一被清除，孝武帝又擴張禁軍，欲藉南征之名討

⁹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25，〈李賢傳〉，頁414。

⁹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25，〈李遠傳〉，頁418-419。

⁹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9-10。

⁹⁷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23。

⁹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33，〈楊薦傳〉，頁570。

⁹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37，〈張軌傳〉，頁664。

伐晉陽，高歡亦集大兵以待，雙方離正式決裂只差一步。¹⁰⁰這時孝武帝親信已看出與高歡一戰勝算渺茫，籌畫退路，如王思政便向孝武帝說，宇文泰若得知皇帝入關，必當「奔走奉迎。」宇文顯和也在孝武帝前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¹⁰¹暗示應西入；柳慶則在見過宇文泰後，斷定他乃「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又在孝武帝彷徨於荊州、關中不決時，指出荊州「地非要害，眾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高)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¹⁰²強化孝武帝入關的決心。但王思政、宇文顯和、¹⁰³柳慶與宇文泰素無交集，為何會認定宇文泰「乃心王室」呢？

宇文泰初掌軍隊不久便與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遇大事必定上表朝廷，表中言詞恭順，更高舉「君臣大義」的旗幟討伐侯莫陳悅，往後又「請奉迎輿駕」，無疑給王思政等人很好的印象。加上關中「有崤函之固」¹⁰⁴又「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荊州則是「危亡是懼」，投奔宇文泰以對抗高歡也是理所應然。

高歡決心遷都鄴城，增加河東、濟州之兵。孝武帝下詔命荊州刺史賀拔勝、東荊州刺史馮景昭赴行在所，¹⁰⁵宇文泰則兼尚書左僕射、關西大行臺。孝武帝並與其聯姻，¹⁰⁶更對楊薦說：「卿歸語行臺(宇文泰)迎我」，¹⁰⁷宇文泰隨即派駱超率領一千騎兵赴洛，又派楊薦與宇文測出關迎接。¹⁰⁸接著傳檄方鎮，正式將高歡定為「賊臣」，將所部說成「義師」，並說會「命群帥，百道俱前，轆裂賊臣，以謝天下。」然而他在孝武帝西遷的過程中，卻只派了三千

¹⁰⁰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9-220。

¹⁰¹ 令狐德棻，《周書》，卷40，〈宇文顯和傳〉，頁714。宇文顯和入關後被視為宇文氏宗室，但宇文泰迎駕時「素聞其善射而未見之也。」可見他與宇文泰只是同姓，並無交往。

¹⁰² 令狐德棻，《周書》，卷22，〈柳慶傳〉，頁369-370。

¹⁰³ 令狐德棻，《周書》，卷40，〈宇文顯和傳〉，頁714。

¹⁰⁴ 李延壽，《北史》，卷62，〈王思政傳〉，頁2205。

¹⁰⁵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22；令狐德棻，《周書》，卷33，〈趙剛傳〉，頁572。

¹⁰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10、13。

¹⁰⁷ 令狐德棻，《周書》，卷33，〈楊薦傳〉，頁570。

¹⁰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10；令狐德棻，《周書》，卷33，〈楊薦傳〉，頁570-571。

騎兵赴洛；¹⁰⁹他雖另派寇洛率馬、步萬餘意圖偷襲汾、晉，更對諸將說要親自帶兵直赴京邑，「使其(高歡)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但不僅寇洛所部並未掀起戰端，宇文泰的前軍更到弘農便止步。¹¹⁰可見宇文泰所發佈的檄文及與諸將之語也和此前所上諸表相同，都是對外博取「大義」名聲，對內安撫擁護諸將的手段而已。

宇文泰在掌軍後，屢屢推遲孝武帝引軍東下之命，但他卻於此時分三次各派一千騎兵入洛。從宇文泰早知孝武帝必敗來看，¹¹¹這三千騎兵入洛的目的不在與高歡決戰，而是要確保孝武帝能安全入關，成功完成「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戰略目標。

宇文泰處心積慮營造「忠君」形象，但孝武帝對西人仍猶豫不決，可能因宇文泰屢屢推遲東下懷疑其忠心，裴俠就認為「圖歡(高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但如柳慶所言，賀拔勝所據的荊州本身即「危亡是懼」，投奔荊州並不可行，只能入關，何況「忠君」名聲佈滿天下的宇文泰未來是否成為高歡第二仍屬未知，高歡的威脅又近在眼前，故裴俠仍建議孝武帝「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¹¹²這應是孝武帝最終決定西奔長安的考量。¹¹³

宇文泰終於盼到了孝武帝，君臣兩人在東陽驛相見，《周書·文帝紀上》載其情況：

太祖(宇文泰)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孝武)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¹¹⁴

《資治通鑑》把《周書·文帝紀上》的「責在朕躬，無勞謝也」改成「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¹¹⁵揆諸史實，《資治通鑑》所言有據。因此後孝武帝

¹⁰⁹ 李延壽，《北史》，卷5，〈魏孝武帝紀〉，頁173；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13。

¹¹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12。

¹¹¹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12-13。

¹¹² 李延壽，《北史》，卷38，〈裴俠傳〉，頁1400。

¹¹³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23。

¹¹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13。

¹¹⁵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6，頁4852-4853。

不但以宇文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更讓「軍國之政，咸取太祖(宇文泰)決焉」，為此還「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¹¹⁶宇文泰不僅完成「挾天子」的目標建立西魏政權，更取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巨大權力。

然而，西魏政權才建立不久，宇文泰即弑殺孝武帝，除無助於團結內部，更會招致擁魏諸將的不滿，動搖其領導地位。於是宇文泰便不像往後廢弑廢帝那般堂而皇之，而是以鳩殺製造孝武帝病死的假像。從高歡到九年後才得知孝武帝被宇文泰所害來看，¹¹⁷孝武帝的真正死因被長期掩蓋，這也是宇文泰鞏固權力的必要手段。

孝武帝一死，勢必要擁立新君。宇文泰最初傾向立幼君元贊，但元順垂涕對宇文泰說：「高歡逼逐先帝(孝武帝)，立幼主(孝靜帝)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元贊)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宇文泰「深然之」，於是改立長君元寶炬，是為文帝。¹¹⁸

元寶炬雖是孝文帝之孫，¹¹⁹血統尊貴，年紀卻大，本不符宇文泰的擇君標準。況且其妹元明月還被宇文泰所殺，¹²⁰但元順的話卻能打動宇文泰，可見在強鄰窺伺、親魏室諸將勢力龐大的情況下，宇文泰不得不顧全大局收斂野心。何況擁戴長君也可宣示其無專權之意，符合宇文泰一貫的「忠臣」立場，便奉戴文帝，以凝聚眾心、獲得民望。

與入關不久即被弑殺的孝武帝不同，文帝不僅在位十六年更得善終，¹²¹顯然甚為瞭解如何與宇文泰相處。在內部穩定的情況下，宇文泰便能高舉「君臣大義」的旗幟作為對抗東魏的憑藉。

¹¹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13。

¹¹⁷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28。

¹¹⁸ 李延壽，《北史》，卷15，〈元順傳〉，頁568。

¹¹⁹ 李延壽，《北史》，卷5，〈西魏文帝紀〉，頁174。

¹²⁰ 李延壽，《北史》，卷5，〈魏孝武帝紀〉，頁174。

¹²¹ 李延壽，《北史》，卷5，〈西魏文帝紀〉，頁181。

四、東、西魏孰為北魏正統？

孝武帝入關使北魏一分為二，東、西兩政權皆自稱為魏，何者為北魏正統便成問題。眾所皆知，令狐德棻所編的《周書》乃以西魏為正統；而李延壽在上《南、北史》表中，以「兼」來形容所撰東魏、北齊四十四年史，¹²²不啻以東魏北齊史乃三代(西魏、北周、隋)之附尾，《北史》自然也以西魏、北周一系為正統。¹²³

令狐德棻、李延壽的「西魏正統說」，後世屢有批評。王夫之就指出東、西魏君權皆不振，兩國亦不屑相比，後世會出現「西魏正統說」是因隋朝沿革西魏、北周政權的緣故。¹²⁴錢大昕則認為李延壽雖情牽北齊，但《北史》的書法卻「右周而左齊」，是因他身為唐臣之故，且《太平御覽》的書法「徇唐人偏黨之私」，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朱熹的《通鑑綱目》相比，立場較不公正。¹²⁵錢大昕的觀點不僅與王夫之相呼應，亦是引申南宋王應麟：「宇文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王)莽也」¹²⁶的看法。錢大昕進一步在眉批中認為東、西魏君權皆旁落強臣手中，史學家不該以西魏為正統，而應同等對待兩政權才是持平之論。¹²⁷

據王夫之、錢大昕之見，李延壽的「西魏正統說」不過是隋、唐政治譜系的產物，隱含勝者為王的歷史意識，並非事實；然而與王夫之、錢大昕同時代的趙翼卻認為孝武帝血統屬孝文帝一系，即位已三年，是時人公認的北魏之主，往後入關，因此北魏正統應屬西魏。¹²⁸

王夫之、錢大昕的說法無疑極有說服力。但被錢大昕所推崇，認定無唐人偏私的《資治通鑑》，卻保存三條不見於其他史籍的史料：

¹²² 李延壽，《北史》，卷100，〈序傳〉，頁3345。

¹²³ 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統觀〉，《史學史研究》，第4期(北京，1990.12)，頁77。

¹²⁴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17，「梁武帝」條，頁577-578。

¹²⁵ 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95。

¹²⁶ 王應麟，《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568。

¹²⁷ 王應麟，《困學紀聞》，頁1568。

¹²⁸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西魏書」條，頁265-266。

(一)、(尔朱渾)道元至晉陽，(高)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群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東魏從之。¹²⁹

(二)、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西魏文帝)將親總六軍，與丞相(宇文泰)掃除凶醜(高歡)。」(高)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宇文泰)、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¹³⁰

(三)、始，獻武王(高歡)自病逐君(孝武帝)之醜，事(孝)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¹³¹

孝武帝入關後，高歡隨即以「寧負陛下，不負社稷」¹³²為由另立新君，則孝武帝與高歡之關係已無涉君臣；且照朝議，孝武帝又被視為桀紂之君，高歡是不用為其「舉哀制服」的，高歡卻在聽到孝武帝死訊後仍欲為其服喪；而在九年後得知孝武帝真正死因，更遺書宇文泰「責以殺孝武之罪」；¹³³又「自病逐君之醜」，恭謹侍奉孝靜帝至死，可知孝武帝入關一事給予高歡的政治打擊異常巨大。因此高歡為減輕孝武帝入關的衝擊，穩固眾心，在擁立新君上採取更為嚴格的標準。

高歡此前廢節閔帝後另立新君，當時他要求：

高祖(孝文帝)不可無後。¹³⁴

元修(後之孝武帝)是孝文帝之孫，故被擁立為帝。此時高歡立君的標準更為嚴格，要求孝文帝一系的國統必須延續，讓神主有依、昭穆有序，¹³⁵於是讓孝文帝的曾孫元善見(後之孝靜帝)，¹³⁶在認孝明帝為父後即位。就此而言，孝靜帝比孝武帝、西魏文帝(亦是孝文帝之孫)擁有更強的君位正當性。¹³⁷

¹²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61。

¹³⁰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67。

¹³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0，頁4958。

¹³²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6，頁4855。

¹³³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28。

¹³⁴ 魏收，《魏書》，卷11，〈出帝紀〉，頁281。

¹³⁵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24。

¹³⁶ 魏收，《魏書》，卷12，〈孝靜紀〉，頁297。

¹³⁷ 李延壽，《北史》，卷5，〈西魏文帝紀〉，頁174。

即使高歡以擁立孝靜帝來強化東魏的統治正當性，¹³⁸但當西魏文帝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更大罵其為「凶醜」時，高歡卻不敢以孝靜帝之名下詔討伐西魏以示正統，只有「移檄於魏」，稱宇文泰、斛斯椿為「逆徒」。高歡「移檄於魏」不只一次，《北齊書·孫搴傳》載：

會高祖(高歡)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¹³⁹

前述高歡雖「移檄於魏」卻無實際行動，¹⁴⁰本條史料明確說高歡因西討而抵風陵渡，可知東魏已然出兵，所以高歡「移檄於魏」至少有兩次。不僅證明《資治通鑑》所載可信，亦顯示在高歡的心中西魏的正統性確實高於東魏。

對此，《北齊書·高德政傳》還有一條更緊要的史料：

時(西魏大統十六年(550))杜弼為長史，密啟顯祖(高洋)云：「關西是國家勁敵，若今受魏禪，恐其(宇文泰)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宇文泰)意亦欲為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眾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學人。」¹⁴¹

杜弼所言重點有二：一是宇文泰「稱義兵」、「挾天子」；一是稱西魏為「關西」，以本國為「魏」。宇文泰所以能「稱義兵」，正是因為「挾天子」。關於「挾天子」，于謹曾向宇文泰獻策，認為孝武帝若西入，宇文泰便能「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¹⁴²在孝武帝入關後，西魏敬珍也說宇文泰「挾天子而令諸侯，已數年矣。」¹⁴³可知宇文泰「挾天子」是時人共識，杜弼雖以本國為正統，也不得不承認西魏的正統性高於東魏。

但若史料遭《北齊書》作者李百藥竄改，便不具證據力。如此，李百藥

¹³⁸ 關於高歡強化東魏正統性的努力與成果，請參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56-92。

¹³⁹ 李百藥，《北齊書》，卷24，〈孫搴傳〉，頁341。

¹⁴⁰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67。

¹⁴¹ 李百藥，《北齊書》，卷30，〈高德政傳〉，頁414。

¹⁴² 令狐德棻，《周書》，卷15，〈于謹傳〉，頁245-246；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6，頁4843。

¹⁴³ 令狐德棻，《周書》，卷35，〈敬祥傳〉，頁626。

必然和令狐德棻編《周書》一般，百端粉飾宇文泰篡位的野心，但從徐之才直陳宇文泰「意亦欲為帝」，可知這條史料應是實錄，並無被變造的跡象。

不僅杜弼，高歡之妻婁昭君與諸勳貴亦認為北魏正統在西魏，《北史·徐之才傳》載：

時自婁太后（婁昭君）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勁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¹⁴⁴

此時已離東、西魏分立已有十六年之久，東魏國力又強於西魏，婁昭君、諸勳貴、杜弼卻仍擔心宇文泰會趁魏齊禪代之際「挾天子而東向」、「挾天子令諸侯」，可知正統性不足的問題始終深深困擾著東魏。

受史料所限，本文僅能直接論證高歡、婁昭君、諸勳貴、杜弼認為西魏正統性高於東魏。論者抑或據此以「所舉證者只能證明特定人物的主張與觀察，斷然無法證明時人皆以為如何」來否定此說，但高歡不是一般人，他是東魏政權的建立者。如果說高歡「自病逐君之醜」是發乎內，外人甚難得知的話；那麼欲為孝武帝服喪、只敢「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的舉措就是形之於外，向天下默認所建東魏正統性不及西魏的事實。高歡尚且如此，時人又怎能不與之有所同感呢？

五、「君臣大義」對東、西魏產生的作用

（一）宇文泰的「挾天子以令諸侯」

東魏的正統性所以不如西魏，是因高歡「逐君」之舉違背了「君臣大義」，也就是說，正因孝武帝入關，依「君臣大義」，西魏擁有東魏難以企及的正統地位，宇文泰便能以此「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據荀彧所論，「挾天子」有三項優勢，分別是：「奉主上以從民望」、「秉至公以服雄傑」、「扶弘義以致英俊」。雖然荀彧的時代離西魏已有三百多年之久，但我們還是能從此三相切入，衡量宇文泰「挾天子」對鞏固西魏、削弱東魏及壓制先進所

¹⁴⁴ 李延壽，《北史》，卷90，〈徐之才傳〉，頁2970-2971。

產生的作用，探究弱小西魏在建政初期能與強大東魏周旋的原因。

1. 奉主上以從民望

孝武帝曾派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率兵入京。馮景昭尚未發兵，孝武帝即入關，所部幕僚馮道和請馮景昭「據州待北方處分」，趙剛抽刀投地云：「公(馮景昭)若為忠臣，可斬(馮)道和；如欲從賊(高歡)，可見殺」，馮景昭遂率眾入關。被趙剛說動欲投靠西魏的人還有李魔憐。¹⁴⁵李魔憐即是與高歡共同舉義，出身趙郡李氏的李愍。他在遷鄴後被任命為東荊州刺史，乃是所謂的「勳貴」。¹⁴⁶這樣的人竟被趙剛說服欲歸附西魏，趙剛所論無疑相當具有說服力。

趙剛是如何讓馮景昭、李愍欲棄東就西呢？從他與馮景昭所言：「如欲從賊(高歡)，可見殺」，可知是將高歡視為「逆臣」。河東豪族敬珍說得更直白，他在沙苑戰前與其從兄敬祥云：

高歡迫逐乘輿，播遷關右，有識之士，孰不欲推刀於其腹中？但力未能制耳。

今復稱兵內侮，將逞兇逆，此誠志士效命之日，當與兄圖之。¹⁴⁷

後來敬珍便與從兄敬祥，聯合同郡豪右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等舉兵，在高歡兵敗沙苑後於其後偷襲，接著率六縣戶十餘萬歸附西魏，從此為西魏鎮守河東之地。¹⁴⁸

驅逐孝武帝的高歡既被定位為有篡位之心的「逆臣」，迎奉孝武帝的宇文泰便被認為是高舉「大義」旗幟之「順臣」，敬珍即認為：

宇文丞相寬仁大度，有霸王之略，挾天子而令諸侯，已數年矣。觀其政刑備

舉，將士用命，(高)歡雖有眾，固非其儔。況逆順理殊，將不戰而自潰矣。¹⁴⁹敬珍所說的「逆順理殊」，即是認為西魏為順、東魏為逆。¹⁵⁰其實連高歡本

¹⁴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33，〈趙剛傳〉，頁572。

¹⁴⁶ 李百藥，《北齊書》，卷33，〈李愍傳〉，頁317-318。

¹⁴⁷ 令狐德棻，《周書》，卷35，〈敬祥傳〉，頁626。

¹⁴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35，〈敬祥傳〉，頁626-627。

¹⁴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35，〈敬祥傳〉，頁626。

¹⁵⁰ 抱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薛善，請參令狐德棻，《周書》，卷35，〈薛善傳〉，頁623。

人都以逐君為醜事，可見這是時人共識。時人既以西魏為正統政權，宇文泰「挾天子」、「舉義兵」便能使東魏內部陷入動亂。在孝武帝西遷後，東魏境內掀起了數起響應西魏的騷動(請參附表 2: 東魏初年歸附西魏人士表, 編號 1-10)。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樊子鵠在兗州發起的起事。

樊子鵠是尔朱氏舊部，立場如前述乃忠於魏室。參與其事除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外，¹⁵¹還有劉鷺「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¹⁵²劉粹亦「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¹⁵³前西兗州刺史乙瑗、譙郡太守辛景威也紛紛起兵響應樊子鵠。乙瑗不僅是孝文帝之婿，更是西魏文帝的岳父。¹⁵⁴而青齊地區的豪族羊深也「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¹⁵⁵

樊子鵠響應西魏的起事規模很大。據〈封祖業墓誌〉的形容，這次的起兵「蛙鳴沫泗，蠅飛宋魯。民未忘禍，從亂如歸。至乃竹鳳彩成，毛面蠅起，楊桴舉斧，頑抗王(東魏)師。」¹⁵⁶而《資治通鑑》描述樊子鵠與婁昭交戰到最後「以眾少悉驅老弱為兵，子鵠死，各散走。」¹⁵⁷足見〈封祖業墓誌〉所述不假，確實有很多平民支持樊子鵠的號召，倒向西魏參與戰事。

西魏既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對戰時的氣勢便高於東魏。沙苑戰前西魏將領王雅對部下說：

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宇文泰)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眾寡。¹⁵⁸

正因「以順討逆」，西魏能以內部強大的凝聚力彌補先天國力的缺陷，從而在攸關政權存亡的沙苑之役中取得大勝，穩住陣腳與東魏長期周旋。這便是荀彧所言「挾天子」的第一項優勢：「奉主上以從民望」。

¹⁵¹ 李延壽，《北史》，卷49，〈樊子鵠傳〉，頁1793。

¹⁵² 魏收，《魏書》，卷55，〈劉鷺傳〉，頁1228。

¹⁵³ 魏收，《魏書》，卷55，〈劉粹傳〉，頁1228。

¹⁵⁴ 李百藥，《北齊書》，卷20，〈宋顯傳〉，頁270；李延壽，《北史》，卷13，〈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傳〉，頁1793。

¹⁵⁵ 魏收，《魏書》，卷77，〈羊深傳〉，頁1705。

¹⁵⁶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345。

¹⁵⁷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64。

¹⁵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29，〈王雅傳〉，頁501-502。

2. 扶弘義以致英俊

沙苑戰後歸附西魏的勢力很多，宇文泰甚至要權景宣節度東南義軍，可見歸附數目之夥。¹⁵⁹但其中大多是因勢而動者，《周書·魏玄傳》：

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為東魏守。嶠東立義者，咸懷異望。¹⁶⁰真正為西魏在前線奮戰的是河東的敬氏、裴氏、韋氏及伊洛的李氏、上洛的泉氏豪族。

雖然河南豪傑在東西魏初分立時多應東魏，但勢力強大的伊川土豪李長壽、李延孫父子及上洛土豪泉企、泉仲遵、泉元禮父子卻忠於西魏。李長壽在孝武帝西遷時，「率義士拒東魏」。¹⁶¹李長壽後被侯景所殺，其子李延孫「每以克清伊、洛為己任」，承繼父兵，繼續對抗東魏，讓高歡「深患之」。¹⁶²李延孫的妹婿韋佑在孝武帝西遷時「從山南赴行在所」，後被西魏任命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援助李延孫。弘農郡守韋孝寬認為韋佑此去很難平安歸來，這時韋佑對他說：

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為國殞身，亦非所恨。李延孫死後，韋佑接替他繼續騷擾東魏伊洛之地。¹⁶³

泉企，《周書》本傳說他「世雄商洛」，可知是上洛的豪族。賀拔勝在荊州時曾推薦他任東雍州刺史。孝武帝欲西奔關中，任泉企為洛州刺史，委以山南之事。孝武帝西遷後，泉企率領「鄉里五千人」抗拒高歡，沙苑之戰，高昂攻下上洛，泉企「矢盡援絕」不得不降東魏，他對高昂說：「泉企力屈，志不服也。」沙苑戰後，高昂帶泉企回東魏，他也對其子泉元禮、泉仲遵說：

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言畢「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泉元禮與泉仲遵遵循父志，「潛與豪右結托」，與鄉人偷襲州城，「斬(刺史杜)窋，傳首長安。」¹⁶⁴泉元禮後在沙苑戰

¹⁵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28，〈權景宣傳〉，頁477。

¹⁶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43，〈魏玄傳〉，頁780。

¹⁶¹ 令狐德棻，《周書》，卷43，〈李長壽傳〉，頁773。

¹⁶² 令狐德棻，《周書》，卷43，〈李延孫傳〉，頁774。

¹⁶³ 令狐德棻，《周書》，卷43，〈韋佑傳〉，頁774-775。

¹⁶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44，〈泉元禮傳〉，頁787-788。

歿，泉仲遵則任洛州刺史抵禦東魏。¹⁶⁵

毛漢光已指出河東豪族的支持，是宇文氏能與高氏抗衡的重要因素。¹⁶⁶〈吳遷墓誌〉所載：

天平之季，凶醜亂合，伊瀍霧起，舉斧縱橫。¹⁶⁷

也能印證毛漢光所論。然而河東敬氏以及稍後提及的裴氏、柳氏等豪族所以歸向宇文氏，是因宇文泰「挾天子而令諸侯」之故。「挾天子」的威力也能從伊洛的李氏、泉氏豪族為西魏力戰的態度上略窺一二。尤其是伊川李氏豪族，他們長期威脅的伊洛一帶，正是北魏舊都洛陽所在，具有高度的政治意義。孝武帝西入時，曾對前來迎駕的梁禦說：

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¹⁶⁸

宇文泰於沙苑大勝後，命元季海與獨孤信攻佔洛陽，接著奉文帝如洛陽拜園陵，¹⁶⁹當為實現孝武帝未竟之願。

對忠於西魏卻未入關的大臣來說，獨孤信入洛正是「背逆歸順」的良機（請參附表 2：東魏初年歸附西魏人士表，編號 21-28），崔彥穆就是其中一人。崔彥穆屬清河崔氏是崔浩的後人，也是韋孝寬的同學。他未能跟隨孝武帝西遷，於是趁獨孤信入洛的機會，「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¹⁷⁰

山東士族此時起兵應西魏的，還有族屬范陽盧氏的盧仲禮與盧景裕兄弟。¹⁷¹

出身河東裴氏的裴寬，在孝武帝西遷後亦以「天子西幸」不願出仕東魏，避難於大石岩，到獨孤信收復洛陽才又任官。裴寬後被東魏所俘，雖深獲高澄賞識，裴寬卻「裁臥氈，夜縋而出」，此後便長期坐鎮孔城與北齊對峙。河東柳氏一族的柳虯也在此時應獨孤信徵辟，¹⁷²其弟柳慶在孝武帝西遷時

¹⁶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44，〈泉仲遵傳〉，頁788。

¹⁶⁶ 毛漢光，〈北朝東西政權之河東爭奪戰〉，《中國中古政治史論》，頁173。

¹⁶⁷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頁447。

¹⁶⁸ 李延壽，《北史》，卷5，〈魏孝武帝紀〉，頁173。

¹⁶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2，〈文帝紀下〉，頁25。

¹⁷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2，〈文帝紀下〉，頁24-25。

¹⁷¹ 魏收，《魏書》，卷84，〈盧景裕傳〉，頁1859。

¹⁷² 令狐德棻，《周書》，卷42，〈柳虯傳〉，頁680-681。

「以母老不從」，後來也隨獨孤信入關。¹⁷³

柳虯不隨高歡遷都鄴城，寧願待在荒廢的陽城「有終焉之志」，¹⁷⁴獨孤信卻能讓他再次出仕，這與獨孤信的背景有相當大的關係。獨孤信是武川人，六鎮之亂時與賀拔岳之父賀拔度拔同斬衛可孤，後被葛榮所獲。尒朱榮平定葛榮以獨孤信為別將，此後從征韓婁、元顥屢立戰功，遷武衛將軍。賀拔勝為荊州刺史時以獨孤信為大都督。賀拔岳死後，賀拔勝派他入關「撫岳餘眾」，宇文泰跟他「少相友善」，便命他入洛請事，孝武帝對他也很欣賞「雅相委任」。

孝武帝西遷，獨孤信「單騎及之於瀘澗」，孝武帝對他的舉動讚歎不已：

武衛(獨孤信)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貞良，豈虛言哉！¹⁷⁵
據宋德熹的研究，獨孤信之父死於大統三年(537)前，獨孤信要到沙苑戰後才得從被俘親屬口中得知其父死訊，獨孤信之子亦稱獨孤信「捐家奉國，秉誠衛主」，¹⁷⁶可知史載不誤，獨孤信的確拋家棄子隨孝武帝入關。¹⁷⁷孝武帝死後，獨孤信外任荊州刺史，後被高昂、侯景所敗與楊忠奔梁。在梁三年屢屢請求還北，最後總算如願。由於獨孤信的父母都在山東，梁武帝便問他要回西魏還是東魏，獨孤信的回答是「事君無二」，意味不選父母所住強大的東魏；而欲入君父所在弱小的西魏。這和他「辭父母，捐妻子」隨孝武帝入關的想法一致，都將「忠」擺在「孝」之前，梁武帝以他棄東入西為義，亦是有鑒於此。¹⁷⁸獨孤信既然死忠西魏，能請出立場相同的柳虯任官也是很自然

¹⁷³ 令狐德棻，《周書》，卷22，〈柳慶傳〉，頁370。

¹⁷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42，〈柳虯傳〉，頁680-681。

¹⁷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16，〈獨孤信傳〉，頁263-264。

¹⁷⁶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474。關於〈獨孤羅墓誌〉的詳細研究可參岡崎敬，〈隋趙國公獨孤羅の墓誌銘の考證〉，《史淵》，第83輯(福岡，1960.12)，頁46-49。

¹⁷⁷ 宋德熹，〈獨孤氏興衰史論〉，《興大歷史學報》，第2期(臺中，1991.06)，頁18-19。

¹⁷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16，〈獨孤信傳〉，頁263-264。唐長孺曾指出：「以一個標榜儒學統治的人一旦取得政權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應該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義在晉初一方面統治者自己說不出口，另一方面他們正要掃除那些忠於魏室的人，在這裡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護自身在儒家倫理上的缺點。」又說：「孝道的過份發展必然要妨礙到忠節。一到唐代，一統帝國專制君主的威權業已建立，那種有害於君主利益的觀點隨著舊門閥制度的衰弱而漸趨消沈。」唐先

的事。

楊忠的政治立場從他是獨孤信的舊部、姻親，往後又不附宇文護而被冷落來看，當是忠於魏室。¹⁷⁹

跟獨孤信同樣不敵東魏南奔梁者，還有賀拔勝、史寧、盧柔、崔謙、崔說等人。賀拔勝被侯景所敗後，率數百騎奔梁，在梁三年屢屢請求還西魏。梁武帝不許，後來由史寧托朱異奏請，總算如願。賀拔勝等為入關付出龐大代價，《周書·賀拔勝傳》說邙山戰後「(賀拔)勝諸子在東者，皆為高歡所害。」又說賀拔勝無子，¹⁸⁰可見賀拔勝也與獨孤信一樣拋棄在東魏的家人毅然入關；而遊說朱異的史寧世居撫寧鎮，年輕時就以軍功任別將，後任直閣將軍、都督宿衛禁中。¹⁸¹初至梁時，梁武帝曾許諾會讓他衣錦還鄉，史寧答道：

臣世荷魏恩，位為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¹⁸²

言畢「涕泣橫流」，可見立場忠於魏室。

崔謙、崔說兄弟屬博陵崔氏，忠於魏室的立場已見前述；¹⁸³盧柔則屬范陽盧氏，他在孝武帝與高歡對峙時曾向賀拔勝進三策，其「忠之上策」即「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盧柔顯然忠於魏朝。但《周書·盧柔傳》卻說：「及魏孝武與齊神武(高歡)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盧)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¹⁸⁴可知其心態功利。但如前所述，在時人眼中賀拔勝即是孝武帝一黨，盧柔不投高歡而隨賀拔勝建功立業，即是忠於孝武帝

生所論不及北朝，然而從獨孤信所為可看出「忠君」已超過了「孝親」，結合北魏末群雄、地方勢力競相以「君臣大義」之名舉兵，可知不逮唐代，早在北魏末「忠君之義」又回到漢代時的地位，這與孝文帝漢化改革建立起的北魏統治正當性密切相關，甚或能視為北朝超越南朝之處，可以作為唐先生之論的補充。唐長孺之說，請參唐長孺，〈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41、249-250。

¹⁷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19，〈楊忠傳〉，頁315、318-319；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點校本)，卷36，〈文獻獨孤皇后傳〉，頁1108。

¹⁸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勝傳〉，頁220。

¹⁸¹ 令狐德棻，《周書》，卷28，〈史寧傳〉，頁465。

¹⁸² 令狐德棻，《周書》，卷28，〈史寧傳〉，頁466。

¹⁸³ 令狐德棻，《周書》，卷35，〈崔謙傳〉，頁611、613。

¹⁸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32，〈盧柔傳〉，頁562。

的表現；再者，盧柔所進三策之下策為「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矣。」這裡的「功名」顯然指得是北魏朝廷所授予的官爵。盧柔不以梁官爵為貴，可知「可著功績」的前提乃是為孝武帝盡忠，因而將盧柔歸入擁魏一黨，應無大誤。

賀拔勝等人返回西魏的路程異常艱險，《周書·盧柔傳》載：

行至襄陽，齊神武(高歡)懼(賀拔)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盧)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太半。至豐陽界，柔迷失道，獨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濕，殆至於死。¹⁸⁵

即使歷經千辛萬苦，賀拔勝、盧柔等人仍要入關，他們對西魏的高度忠誠也由此展現出來。

河東豪族柳氏、敬氏、裴氏；山東士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趙郡李氏與六鎮豪強獨孤信、楊忠、賀拔勝、史寧效忠魏室而欲入關中的例子，正是荀彧所言「挾天子」的第三項優勢：「扶弘義以致英俊」。

3. 秉至公以服雄傑

賀拔勝入關後卻「以年位素重，見太祖(宇文泰)不拜」，但「尋而自悔」、「盡誠推奉」。賀拔勝是賀拔岳之兄，宇文泰則是賀拔岳的部下，年紀、資歷又低。賀拔岳死後，諸將即有邀賀拔勝入關統領之意，李虎更奔赴荊州敦請，對賀拔勝來說關中軍本應屬於他，入關後以資歷自傲也是當然，但為何他會「尋而自悔」轉為服從宇文泰呢？史書無載其因，葉適之論當貼近實情：

特以魏孝武(帝)棄東就西，輕重勢激而然。主威既奪而成臣之威，可不懼歟！¹⁸⁶ 葉適所言即是荀彧所謂「挾天子」的第二項優勢：「秉至公以服雄傑」。賀拔勝以年位自矜卻死忠於魏室，如此即使再不情願仍須屈從「挾天子」的宇文泰。地位最高的賀拔勝尚且如此，寇洛等擁魏諸將更須服從宇文泰的指揮。

從上述所論可知，宇文泰「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僅能「從民望」、「致英俊」還能以之「服雄傑」。除了吸引才俊支持西魏、削弱東魏外，更能鞏

¹⁸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32，〈盧柔傳〉，頁563。

¹⁸⁶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35，「周書·賀拔勝傳」條，頁523。

固其在政權的領導地位。

宇文泰固然以「君臣大義」「挾天子」取得巨大的政治利益，但在擁魏勢力強大的西魏，卻不得不耗費二十三年的漫長時間，拉攏、壓制死忠魏室的將領逐步佈局篡位，¹⁸⁷往後即使時機成熟仍不敢親身移鼎。司馬光論曹操不欲自立之因云：

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曹操)之暴戾強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君臣大義)而自抑也。¹⁸⁸

北魏末群雄亦「未嘗不以尊魏為辭」，競相以「君臣大義」為名舉兵，高歡更終身以逐君為醜，恭謹侍奉孝靜帝至死；至於宇文泰，不僅與曹操一般「挾天子以令諸侯」成就霸業、也「蓄無君之心久矣」，最後都要當周文王(曹操：「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宇文泰在北周建國後的諡號即是「周文王」¹⁸⁹)，皆「沒身不敢廢漢(魏)而自立」。與曹操不同的是，曹魏率先於其他二國建政；而宇文周卻是在高齊建國(550)七年後(557)才登場。更值得注意的是，宇文泰在臨終前命其侄宇文護「勉力以成吾志」，輔佐其子宇文覺禪代。¹⁹⁰其實早在北齊建立後四年(554)，西魏廢帝被廢時，宇文泰的心腹就勸其移鼎，卻遭拒絕。¹⁹¹宇文泰如於此時踐祚，不僅有高洋代魏前例可循，且據呂春盛的研究，正是在這一年西魏滅梁結束了劣勢時期，來年進入均勢時代。¹⁹²可見宇文泰所以不篡，並非顧慮北齊，而是如曹操一般「畏名義(君臣大義)而自抑」。

¹⁸⁷ 胡勝源，〈體制變革與魏周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頁75-102。

¹⁸⁸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68，頁2173。

¹⁸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3，〈孝閔帝紀〉，頁46。

¹⁹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1，〈宇文護傳〉，頁166。

¹⁹¹ 李延壽，《北史》，卷36，〈薛端傳〉，頁1328。

¹⁹²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頁111。

(二)東魏「人情去留未定」之因

就本文所見史料，西魏初期有可朱渾道元、万俟普、曹泥、劉豐生、元景安、狄湛等叛入東魏，李叔仁通使東魏失敗被殺，(請參附表 3：西魏初年歸附東魏人士表，編號 1-4)還有趙青雀之亂。首先是可朱渾道元，他在宇文泰討伐侯莫陳悅時，就與其聯合對抗宇文泰，後來逃入秦州，被宇文泰率軍圍攻，最後歸順東魏。可朱渾道元與高歡為舊識，且母親與兄長都在鄴，¹⁹³投奔東魏既能與家人團聚又可得高官顯爵，自然是最好的選擇。

曹泥與劉豐等人的情況也與可朱渾道元類似。曹泥在賀拔岳當權時就不服號令與高歡通使，賀拔岳便是在討伐曹泥的途中被殺。因此當關中局勢穩定後，也會如可朱渾道元一般，除東奔外無路可走。與曹泥一起投奔高歡的劉豐，可朱渾道元東出前向他稱讚高歡「英武非常，克成大業」，那時劉豐即有投奔高歡之意。¹⁹⁴其後，便與曹泥一起歸附東魏。至於万俟普父子會率部歸順高歡，也因在高歡舉義時就向其遠通誠款，此時也趁機東走。¹⁹⁵

元景安是尔朱榮舊部，高歡入洛後，婁昭推舉他為京畿都督，加前將軍，太中大夫；而婁昭是高歡的妻弟，他向高歡推舉元景安擔任統領禁軍的前將軍一職並獲得認可，元景安與高歡關係應不尋常，可能是高歡安插在孝武帝身邊的心腹，後來隨其入關。東魏初年，高歡討伐西魏，元景安「臨陣自歸」，也能作為上述推測的一證。¹⁹⁶

狄湛史書無傳，羅新、葉煒依新出土的〈狄湛墓誌〉考證出他乃狄仁傑之高祖。¹⁹⁷〈墓誌〉說他「被勒侍從(孝武帝)，隨到咸陽，深識順逆之機，悟知禍福之理，遂與建州刺史王保貴擁騎歸朝。」¹⁹⁸可見狄湛與元景安相同，皆是隨孝武帝入關，往後又歸附東魏者。

李叔仁是隴西人「驍健有武力」，曾參與平定邢杲之役，往後被任命為

¹⁹³ 李百藥，《北齊書》，卷27，〈可朱渾道元傳〉，頁376。

¹⁹⁴ 李百藥，《北齊書》，卷27，〈可朱渾道元傳〉，頁377。

¹⁹⁵ 李百藥，《北齊書》，卷27，〈万俟普傳〉，頁375。

¹⁹⁶ 李百藥，《北齊書》，卷41，〈元景安傳〉，頁542。

¹⁹⁷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頁173。

¹⁹⁸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頁172。

涼州刺史。侯莫陳悅死後，《周書·文帝紀上》說他「為其民所執，舉州騷擾」；¹⁹⁹《北史·雷紹傳》卻說：「(侯莫陳)悅平，(雷紹)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²⁰⁰李叔仁是涼州當地人，所謂「為其民所執，舉州騷擾」乃是「擁州逆命」的美化之言，亦反映其地方實力強大。這從事後的大統二年(536)三月，西魏讓李叔仁以涼州刺史遙領司徒，亦可略知一二。²⁰¹李叔仁在侯莫陳悅死後卻仍「擁州逆命」，當與可朱渾道元、曹泥一般，不從宇文泰的領導，往後通使東魏亦屬必然。

至於趙青雀之亂，則是宇文泰前去救援洛陽獨孤信時，「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為亂」的結果。²⁰²

再進一步分析，除狄湛外，其餘歸附東魏的可朱渾道元等人，或與西魏早有嫌隙無法立足；或是與高歡早有私交者。與大多數以舉義為名西入關中者相比，不僅在數量上，甚至在名義上都遠不相及。

東魏不僅缺乏吸引西魏人士歸附的魅力，在建政初期連高層官員亦有欲投奔西魏者，前述與高歡共同建義的「勳貴」李愬，欲以州歸附西魏即是一例；此外也有元子思、元子華通使關西；費孝遠、裴測西入關中，從中亦可窺見當時東魏羣臣人心浮動不安的情況。(請參附表 2：東魏初年歸附西魏人士表，編號 13-15)

陳寅恪曾以高歡與杜弼的對話為例，認為宇文泰因關隴財富文化皆不如東魏、梁，便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以維繫胡漢人心。²⁰³然而，費孝遠是河陰之變元兇武夫費穆之次子；²⁰⁴裴測則是齊東昏侯時投奔北魏裴叔業之曾孫，²⁰⁵曾任通直散騎侍郎一職，視為中原士大夫亦不為過。他們卻對東魏的富饒、承襲自洛陽的典章文物毫不留戀，西奔「財富文化兩俱不如」的西魏，

¹⁹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1，〈文帝紀上〉，頁9。

²⁰⁰ 李延壽，《北史》，卷49，〈雷紹傳〉，頁1807。

²⁰¹ 李延壽，《北史》，卷5，〈西魏文帝紀〉，頁176。

²⁰² 令狐德棻，《周書》，卷2，〈文帝紀下〉，頁26。

²⁰³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102。

²⁰⁴ 魏收，《魏書》，卷44，〈費孝遠傳〉，頁1003-1005。

²⁰⁵ 魏收，《魏書》，卷71，〈裴測傳〉，頁1568。

因此便有重新檢討高歡與杜弼之言的必要。

高歡與杜弼的對話，可分成三個部分：一是督將家屬多在關西；二是中原士大夫以江東為「正朔所在」；三是在「人情去留未定」的情況下，若大刀闊斧整飭貪污，東魏「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²⁰⁶

在將領家屬多在關西部分。胡三省以為：

此言指可朱渾道元、万俟普、劉豐生等部曲也。²⁰⁷

万俟普族屬匈奴別部，在北魏末曾被封為第二領民酋長。²⁰⁸據周一良的研究，在這時期被封為領民酋長的人通常原本就是部落酋長。²⁰⁹可知，万俟普是攜部投奔高歡的，其中便包含許多眷屬。與万俟普一起投奔東魏的人還有破六韓常，史傳說他「匈奴單于之裔也……世領部落」，²¹⁰破六韓常往後被授與第一領民酋長之職，因也與万俟普相同，投奔東魏時有大量的眷屬隨行。至於可朱渾道元所率領的三千戶與劉豐生統帥的五千戶，²¹¹人數都很多，其中也應有家眷。

督將家屬較有可能留在西魏者是狄湛、元景安。〈墓誌〉並無著墨狄湛的家庭，很可能仍滯留於西魏；元景安則是在陣前投誠東魏，此舉甚難攜眷東出。但《北齊書·本傳》說他有一子元仁，北齊武平末任儀同三司。又載他向高洋告發不願改高姓的堂兄元景皓，附及堂弟元景豫為元景皓作證諸事，²¹²可知元景安的親人大多仍在東魏。

²⁰⁶ 李百藥，《北齊書》，卷24，〈杜弼傳〉，頁347-348。

²⁰⁷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81。

²⁰⁸ 李百藥，《北齊書》，卷27，〈万俟普傳〉，頁375。

²⁰⁹ 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周一良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一卷，頁231-232。

²¹⁰ 李百藥，《北齊書》，卷27，〈破六韓常傳〉，頁378-379；李延壽，《北史》，卷53，〈可朱渾道元傳〉，頁1901。

²¹¹ 李延壽，《北史》，卷53，〈可朱渾道元傳〉，頁1901；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70。

²¹² 李百藥，《北齊書》，卷41，〈元景安傳〉，頁544：「疏宗如(元)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元景)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

最後，在東魏龐大的部將陣營中，可朱渾道元、狄湛、元景安等由西魏投奔的將領不過是極少數，縱使他們的家屬仍有留在西魏者，也不足以讓所有東魏將領都產生「人情去留未定」的不安氣氛。

高歡所說都將家屬在關西者，應是指他旗下將領的眷屬，但是此說可信度不高。六鎮流民在幾經轉手後統合在葛榮的旗下，葛榮被尔朱榮擊潰後，統領的數十萬流民中有二十餘萬流入并州、肆州，其餘則四散在山東各地。²¹³流入并州、肆州的二十餘萬人即便「誅夷者半」，²¹⁴也還有十餘萬人被高歡所得。因此高歡不僅掌握了并、肆二州的六鎮流民，在他所管轄的山東境內原本就居住著為數頗多的六鎮流民。高歡出身六鎮，他的手下很多也都是出自六鎮的將領，他們活動的區域都在山東，眷屬流落到關西者自然不多。

就算是叛逃或戰亂而入關者，家屬往往也留在東魏。如高乾弟高慎，因與高澄、崔暹不合，以北豫州叛附西魏，其「妻子將西度，(東魏)於路盡禽之。」²¹⁵高穎父高賓「同列有忌其能者，譖之於齊神武(高歡)。賓懼及於難，大統六年(540)，乃棄家屬，間行歸關。」²¹⁶陸騰被西魏所俘，宇文護東征欲命其參戰，偽造文書稱「齊為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陸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²¹⁷

西魏的肇建可追溯至尔朱天光率賀拔岳等將領入關平亂，但他們的軍隊不過一千多人，²¹⁸且家屬似乎多留在山東，宇文泰本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宇文泰的長兄宇文顥與衛可孤交戰時戰歿，三子：宇文什肥、宇文導、宇文護。²¹⁹宇文導、宇文護先後入關，宇文什肥因不能離母留在晉陽，後被高歡所殺；²²⁰其子宇文冑「以年幼下蠶室」，天和年間才入關。²²¹宇文顥的

²¹³ 魏收，《魏書》，卷74，〈尔朱榮傳〉，頁1650；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3。

²¹⁴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13。

²¹⁵ 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慎傳〉，頁293。

²¹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37，〈高賓傳〉，頁670。

²¹⁷ 令狐德棻，《周書》，卷28，〈陸騰傳〉，頁471-472。

²¹⁸ 魏收，《魏書》，卷75，〈尔朱天光傳〉，頁1673。

²¹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10，〈宇文顥傳〉，頁153。

²²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0，〈宇文什肥傳〉，頁153-154。

²²¹ 令狐德棻，《周書》，卷10，〈宇文冑傳〉，頁154。

妻子則淪為配口徙中山宮。²²²宇文泰的二兄宇文連與北魏軍隊作戰而死，其子宇文元寶後也被高歡所殺。宇文泰的三兄宇文洛生被尔朱榮所害，其子宇文菩提亦被高歡所殺。宇文泰的堂兄宇文興也留在東魏，後因交戰被俘才得以入關，宇文泰的其他親戚也都在東魏。²²³

不僅宇文泰，賀拔勝、獨孤信、裴俠等人也都有家屬仍滯留山東。²²⁴賀拔勝諸子在邙山戰後都被高歡所殺；²²⁵獨孤信的長子獨孤羅則待在東魏，命運多舛，²²⁶〈獨孤羅墓誌〉說他：「播越兩河，流離三魏」；²²⁷《隋書》本傳亦稱：「及(獨孤)信為宇文護所誅，(獨孤)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²²⁸獨孤羅的遭遇應是當時西魏都將滯在山東家屬的縮影。

在中原士大夫以江東為「正朔所在」的部份。北魏末年屢有元氏宗室、大臣避難江左，前述元悅、賈顯度、賀拔勝、獨孤信等都是例子。在這些人中梁武帝最看重元氏宗室，常常資以士兵使之還北，視為混一南北的嘗試，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元顥的北伐。

元顥是孝文帝弟北海王元詳之子，他聽聞河陰慘案後隨即奔梁。梁武帝派陳慶之將兵五千，護送他歸國。²²⁹陳慶之率軍逼近洛陽，孝莊帝倉皇辭廟，元顥遂入洛。元顥是帝室近親，卻對梁稱臣，北魏士人如視梁為正朔所在，這時正是「背逆歸順」的大好良機，然而事實卻非如此。元天穆見元顥的軍勢甚大欲還北，溫子升勸他：

王(元天穆)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舍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²³⁰
溫子升是溫嶠之後，其祖溫恭之，劉宋時避難北魏。他是當時著名的文人，

²²²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韶傳〉，頁211。

²²³ 令狐德棻，《周書》，卷11，〈宇文護傳〉，頁169。

²²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35，〈裴俠傳〉，頁618。

²²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14，〈賀拔勝傳〉，頁220。

²²⁶ 魏徵，《隋書》，卷79，〈獨孤羅傳〉，頁1789。

²²⁷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頁474。

²²⁸ 魏徵，《隋書》，卷79，〈獨孤羅傳〉，頁1789。

²²⁹ 魏收，《魏書》，卷21上，〈元顥傳〉，頁564-565；楊銓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2，〈平等寺條〉，頁95。

²³⁰ 魏收，《魏書》，卷85，〈溫子升傳〉，頁1876。

元淵稱讚他「才藻可畏」，孝莊帝也說他是「當世才子」。²³¹溫子升是中原士大夫，照高歡所言應以南朝為正朔，但這時他卻勸元天穆「克復京師」，稱此為「桓文之舉」，可見其忠於魏室。

不僅溫子升，山東士族亦以元顥為逆。廣陵王元欣欲受元顥赦，這時軍司崔光韶抗言曰：

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元欣)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²³²

崔光韶屬清河崔氏，乃是山東四姓之一，也是停年格創造者崔亮的從父弟。元欣認為元顥與元子攸都是獻文帝之孫，即便元顥為帝，宗廟仍不變，有意臣服其下。崔光韶卻把「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的元顥視為「亂臣賊子」不願歸附。此外，鄭偉的父親鄭先護也不願依附元顥，²³³山東士族擁戴魏室的立場皎然可見。

其實元顥入洛後也與元彧、元延明圖謀叛梁，只因仍須借陳慶之之力以抗尔朱榮，不得不與梁暫時合作。往後元顥也擔心陳慶之得到援兵後會難以駕馭，便上疏梁武帝婉拒增兵。²³⁴可見元顥不過是利用梁，並非真心以梁武帝為君。

陳慶之入洛後與楊元慎對正統所在有一番爭辯。陳慶之認為正統在江左，楊元慎則批判南朝「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更對其鄙夷至極，極盡詆毀之能事；對北魏則稱頌備至，直稱「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楊元慎史書無傳，《洛陽伽藍記》說他是中原士族，即是高歡所稱的「中原士大夫」，²³⁵他卻認為北魏才是正統，而非南朝。

楊元慎所言並非夜郎自大。陳慶之回梁後以「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來形容此行的震撼，此後也「羽儀服式悉如魏法」，竟讓南朝士

²³¹ 魏收，《魏書》，卷85，〈溫子升傳〉，頁1874-1875。

²³² 魏收，《魏書》，卷66，〈崔光韶傳〉，頁1842-1843。

²³³ 令狐德棻，《周書》，卷36，〈鄭先護傳〉，頁633。

²³⁴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卷32，〈陳慶之傳〉，頁462-463。

²³⁵ 楊銓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2，「景寧寺」條，頁104-106。

庶競相仿效，²³⁶可知這不只是陳慶之個人的觀點，也是南朝的共識。²³⁷

在「人物流散，何以為國」部分。東魏都將家屬既多不在西魏，中原士大夫也多不以南朝為「正朔所在」，高歡為何還擔心整飭貪污會讓東魏「人物流散」呢？政權內部的政治衝突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據呂春盛的研究，此時高歡一邊壓抑漢族武裝勢力，一邊提拔北鎮親信掌握政權，使元氏勢力無力反抗，因此東魏並未爆發北齊那般激烈的政治衝突，²³⁸可知此說的可能性並不大。

高歡對杜弼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²³⁹明確指出「正朔所在」對東魏人物的強大吸引力；而多數中原士大夫認知的「正朔所在」如上述所言已在北魏，北魏此時又分東魏與西魏，據前述分析可知，西魏的正統性高於東魏。那麼高舉「君臣大義」旗幟的宇文泰能「常相招誘」的，就不只是樊子鵠(母在晉陽、在洛無宅)、²⁴⁰李愬(山東趙郡李氏)等家屬不在關中卻心向西魏的東魏都將，也有視西魏為北魏正統所在的中原士大夫，這從盧仲禮、崔彥穆響應西魏舉兵也看得很清楚。

當時東魏人心惶惶，被告潛通西魏者即遭嚴懲。如大統二年(536)，濟陰王元暉業與七兵尚書薛琬被告「貳於(西)魏」，皆免官。²⁴¹同年閭闔門火災，高歡義弟高隆之告太府卿任忻集「潛通西魏，令人故燒之」，高歡便殺了任忻集。²⁴²值得注意的是，高歡與杜弼談話的時間在大統三年(537)九月；²⁴³而正在此年十月，東魏於沙苑被西魏所敗，「喪甲士八萬」，²⁴⁴當西魏證明自身不僅能「以順討逆」，也能挫敗東魏凌厲的攻勢後，高歡憂心的「人物流

²³⁶ 楊銓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2，「景寧寺」條，頁107-108。

²³⁷ 何德章，〈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頁60-61。

²³⁸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191-196。

²³⁹ 李百藥，《北齊書》，卷24，〈杜弼傳〉，頁347-348。

²⁴⁰ 魏收，《魏書》，卷80，〈樊子鵠傳〉，頁1778。

²⁴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67。

²⁴² 李百藥，《北齊書》，卷18，〈高隆之傳〉，頁235；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68。

²⁴³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8，頁4921。

²⁴⁴ 李延壽，《北史》，卷54，〈斛律金傳〉，頁1966。

散」便成為現實。敬珍、敬祥、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裴果、薛善、薛濟、薛馥、高子信、賀若統、張儉、鄭榮業、鄭頂、崔彥穆、檀深、鄭偉、劉志、邢摩納、盧仲禮等地方勢力蜂起響應西魏；裴邃、裴寬、裴諏之、柳虬、柳慶等士族競相歸附入洛的獨孤信。(請參附表 2：東魏初年歸附西魏人士表，編號 18-28)因此，東魏國力雖強，內部人心卻因正統性不及西魏而渙散，沙苑之敗暴露了此一內情，坐實了高歡的憂慮，這正是他在東魏初期不敢貿然整肅貪瀆的原因。

高歡擔憂「人物流散，何以為國」不敢整頓官員風紀，卻在言談的最後對杜弼說：「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因此當高歡開始打擊貪污，便是東魏轉危為安之時。而東魏大舉肅貪要到大統十年(544)，²⁴⁵此時離高歡與杜弼談話的大統三年(537)已歷七年。如果從大統元年(534)東、西魏分立開始算起，東魏的不穩期更長達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高歡要到西魏於大統九年(543)邙山大敗，專注內政的後一年才敢大規模整飭官員紀律，²⁴⁶此前東魏處境之艱難，亦可想而知。

(三)高歡維繫東魏人心的努力

但仍有問題未解，那就是高歡為何所言不實呢？在回答這問題之前，應該瞭解何事讓高歡最為在意？高歡死於大統十三年(547)，東魏的情勢要到大統十年(544)才穩定，也就是說他後半生大多數的時間都處在高度憂慮中。東魏人心動盪不安，根本是因高歡「迫逐乘輿，(孝武帝)播遷關右」，也因而世人多以高歡「逐君」後即要篡位，他亦自陳：「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²⁴⁷，為消除謠言、穩固人心，尊崇孝靜帝便是必然之舉。《資治通鑑》說高歡「事(孝)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他在臨終當天甚至還對孝靜帝上最後一啟，²⁴⁸司馬光據此高度評價高歡：

神武(高歡)以高世之略，平尔朱之亂，功大勢盛，為孝武帝所疑。雖有逐君之

²⁴⁵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64。

²⁴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2，〈文帝紀下〉，頁28。

²⁴⁷ 李百藥，《北齊書》，卷42，〈陽修之傳〉，頁562。

²⁴⁸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1。

慚，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²⁴⁹

宋人南宮靖一對高歡臨終上啟感慨更深：

權其輕重而論之，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

拳於其君；宇文(泰)垂死之夕，惟戀戀於其子，兩人之用心，亦可知矣！²⁵⁰

《資治通鑑》對高歡也許有所溢美，但在高歡執政時期，元氏及親元氏大臣未曾有謀反之舉。可是當高歡一死，高澄執政「倨慢頓甚」，不僅派人監視孝靜帝，更令崔季舒毆帝三拳，孝靜帝「不堪憂辱」，常侍荀濟「知帝意」，便與元大器、元瑾、元徽、元宣洪，從宮中作地道，意圖謀反。²⁵¹如此，亦可證《資治通鑑》所言非虛。

高歡也屢次發動大戰企圖一消滅西魏，最終因未能攻下玉壁，含恨而終。葉適對此有嚴厲的批評：

東(魏)之比西(魏)，土地甲兵十倍，若持重養威，以計縻敵，自可從容全勝。

然十年間汲汲三大戰，幾不免其身，智勇俱困，而秦與六國形勢見矣。是(高)

歡自反尔朱之外，了無所能，世或以為人雄者，誤也。²⁵²

高歡為何不以強盛國力「持重養威」、「從容全勝」，非要親自領軍與西魏大戰不可呢？《北齊書·陳元康傳》載高歡臨終之言：

邙山之戰，不用(陳)元康之言，方貽汝(高澄)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²⁵³

高歡打敗尔朱氏軍抵邙山，召集文武百官、士庶，討論「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綦儁主張節閔帝「雖為尔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高歡「欣然是之」，但遭崔陵、高乾、魏蘭根反對，於是改立孝武帝。孝武帝後來卻西奔關中，高歡往後「深思(綦)儁言，常以為恨」，²⁵⁴高歡之子孝昭帝高演的志向亦是：

雪神武(高歡)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²⁵⁵

²⁴⁹ 佚名，《歷代名賢確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65，第687冊，頁687-544。

²⁵⁰ 南宮靖一撰、晏彥文續，《小學史斷》，收入天津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卷2，頁592。

²⁵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0，頁4958-4959。

²⁵²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35，「北齊書·神武紀」條，頁511-512。

²⁵³ 李百藥，《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3。

²⁵⁴ 魏收，《魏書》，卷81，〈綦儁傳〉，頁1792。

²⁵⁵ 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272。

對高歡來說，若不改立孝武帝便不會有「逐君之醜」，西魏正統政權也不會建立，這是他一生功業的最大污點，無怪乎他會「常以為恨」。此外，西魏在沙苑戰前「大饑，人相食，死者十七八」，²⁵⁶在如此極端不利的情况下，西魏都能締造沙苑大捷，高歡若「持重養威」，只會遺患子孫。更重要的是，高歡若不親手消滅西魏，在他有生之年，東魏便低西魏一等，他的歷史地位也永遠是「逐君逆臣」。但韋孝寬在玉壁堅強的防禦，毀滅了高歡最後的希望，自知來日無多的他才會在和敕勒歌時「哀感流涕」，²⁵⁷最後懷恨而逝。

高歡對「逐君之醜」耿耿於懷，如要穩固東魏、抹去畢生恥辱就要「尊崇年輕君主」、「包容貪腐文武」、「消滅正統西魏」，這是高歡的「三個堅持」。其中「包容貪腐文武」在大統十年(543)因情勢穩定而改易，其他兩個堅持則持續到他過世為止。

杜弼在大統五年(537)曾勸高歡受魏禪，高歡「舉杖擊走之」；²⁵⁸此前陽休之亦曾勸高歡「受天命」，高歡答道：

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²⁵⁹

杜弼勸高歡篡位，顯然是高歡心中的「世人」之一，所說被看做是「妄言」，這是對第一堅持的冒犯。杜弼在沙苑戰前，兩次請高歡「先除內賊(貪腐文武)，卻討外寇(西魏)」，這是對第二、第三堅持的否定。第一次被高歡以「人物流散，何以為國」所拒，第二次高歡「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杜)弼冒出其間」，杜弼「戰慄汗流」，頓頹謝曰：

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與利用高歡對「人物流散」的恐懼，成功挾怨報復的高隆之相比，杜弼接連侵犯「三個堅持」卻不自知，可見他確實不明高歡的心意。

回頭來看高歡與杜弼之言，中原士大夫多以江東為正朔說雖不確，但也可能仍有少數士人以南朝為正統；督將家屬亦然，雖然大多數東魏督將家屬在山東，但也不排除有少數滯留關西者(如前述的元景安)。「自病逐君之醜」

²⁵⁶ 李延壽，《北史》，卷5，〈西魏文帝紀〉，頁176。

²⁵⁷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0。

²⁵⁸ 李百藥，《北齊書》，卷24，〈杜弼傳〉，頁347。

²⁵⁹ 李百藥，《北齊書》，卷24，〈杜弼傳〉，頁347-348。

的高歡應是在不瞭解其心意的杜弼面前，特意突出少數東魏士人、督將的問題，以掩蓋「逐君之醜」所帶來東魏正統性不足的大病，言談間卻仍不經流露對「正朔所在」的高度重視。高歡避重就輕的說法無法說服杜弼，他才會再次進諫。²⁶⁰

在這裡異常顯眼的是杜弼之矛盾。杜弼矛盾之處有二：一是他勸高歡篡位，往後當高洋欲移魏鼎時，卻以「恐其(宇文泰)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高洋)將何以待之」反對。另一是他顯然明白東魏政權正統性弱於西魏，沙苑戰前卻勸高歡在內部不安的情況下整飭文武紀律。

杜弼要高歡「先除內賊(貪腐文武)，卻討外寇(西魏)」，高歡若採納此策，便要暫緩西征，專注內政；因此杜弼進言的目的也是要穩定局勢，只是思路、作法與高歡完全相反。東魏人情不安原因是高歡不僅逐君又隨時可能篡位，但若高歡受魏禪稱帝，便能與同僚確定君臣名分「一人得之，眾心皆定」；且當時「貪腐文武」多是元氏或是親元氏大臣，²⁶¹肅貪能讓高歡一邊剷除擁護元氏的朝臣，一邊提拔心腹官員，為移鼎鋪路。也就是說，若高歡欲取魏代之，大舉肅貪便是必要手段，杜弼兩次請求高歡整肅政風，實與勸其代魏互為表裡。

但高歡「自病逐君之醜」，視杜弼之論為「妄言」，不僅以「三個堅持」與西魏力爭正統，更寬待忠義守節之士，《北史·齊神武紀》載：

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²⁶²

韓毅史書無傳，《北史·高洸傳》說他教高歡第五子高洸書法，²⁶³與上述「工書顯」相契合。盧景裕則在大統三年(537)隨其從兄盧仲禮響應西魏叛變。²⁶⁴(請參附表2：東魏初年歸附西魏人士表，編號23)因此所謂的「謀逆」，便是視西魏

²⁶⁰ 李百藥，《北齊書》，卷42，〈陽休之傳〉，頁561-562；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57，頁4878。

²⁶¹ 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頁97-99。

²⁶²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2。

²⁶³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洸傳〉，頁1861-1862。

²⁶⁴ 魏收，《魏書》，卷84，〈盧景裕傳〉，頁1859。

為正統而舉兵者；前述與樊子鵠起兵的劉鷟，後來兵敗被擒送晉陽，高歡也「矜而赦之」。「蒙恩」受赦的「謀逆」官員還有崔混，〈崔混墓誌〉載：

（崔混）後除鎮遠將軍。……天平之季，王略未康，霧委嶠秦，氛結榮鄭，亭烽夜舉，傳鼓朝聞。海代之間，地牟百二，山川險固，勢侔西京，負阻乘間，紛或易起。忽有羣凶，密圖不逞，以君德望既重，物情所屬，希藉聲援，潛來推逼。君時在疾，守侍幾筵，事出不虞，變起慮外，造次之間，未能自拔，遂被推迫，低眉寇手。然泣臨如常，纓絰不解，徑踰信宿，方免豺狼。雖醜妖尋散，大宥繼敷。然君操烈冰霜，心貞松玉……況被逼匈奴人，欲謀非義……遂乃飲粒不嘗，聲泣相繼。宗姻妻子，靡能開喻。以元象元年(538)二月五日奄至物故。²⁶⁵

崔混史書無傳，涉入的叛亂不明，但由「天平之季」可知是孝武帝西遷後，東魏內部響應西魏諸多變亂的其中一起。據〈墓誌〉，崔混竟是帶孝舉兵，可見其忠於西魏，舉事失敗後「蒙恩」受赦，不久即過世。

早在與孝武帝不睦而入洛時，高歡即表現他對忠義之臣的看重，〈裴良墓誌〉載：

永熙二年(533)，天子(孝武帝)宸居為政，思弘治道，臆言民瘼，夢想其人。出(裴良)為汲郡太守，常侍、將軍如故。……既而鸞起蕭牆，交喪雲集。此郡南面長河，北連漳滏，大兵所冲，必爭之勢。乃授君使持節、假驃騎大將軍、都督汲郡諸軍事，餘如故。暨天方棄我，一椽弗維，九州百郡，望風淪沒。君奉己以忠，義在授命，本圖既爽，遂縲紲赴徵。相國渤海王(高歡)，一面相歡，便以禮見遇。天平元年(534)，主上(孝靜帝)援立，為御史中丞。十月，除太府卿，餘如舊。²⁶⁶

裴良《魏書》有傳，但只載其「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²⁶⁷省略了被俘以及御史中丞的任官，〈墓誌〉則提供更多《魏書》不載的重要訊息。如裴良任汲郡太守，是孝武帝與高歡決戰佈局的一環，往後裴良亦為其力戰被俘，可知是忠於孝武帝者。高歡所以釋放裴良，往後更

²⁶⁵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頁327。

²⁶⁶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頁199-200。

²⁶⁷ 魏收，〈《魏書》〉，卷69，〈裴良傳〉，頁1532。

提拔他擔任御史中丞，是因其「奉己以忠，義在授命」之故。與裴良同族的裴讓之，亦曾受高歡赦免，《北史·裴讓之傳》載此事云：

（裴讓之）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高歡）問曰：「諏之何在？」

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卻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²⁶⁸

高歡所以釋放裴讓之全家，是因欣賞其「失忠與孝，愚夫不為」的一番言語，亦是推崇「君臣大義」的表現。

高歡不僅重視「君臣大義」，尊崇孝靜帝至死，更寬容心向西魏的官員，便使「遐邇歸心，（文武）皆思效力」，進而扭轉了東魏初期「人情去留未定」的困境。也就是說，高歡亦是高舉「君臣大義」的旗幟，才能在東魏統治正當性不足，自身又被視為「逐君逆臣」的情況下逐漸穩定大局。

高歡戮力提倡「君臣大義」，縱然情勢穩定後開始整肅貪瀆，對忠於元氏的「貪腐文武」亦大多高舉輕放。²⁶⁹到了東魏末，不僅「河北物情，俱念其主（孝靜帝）」，²⁷⁰也讓高澄、高洋篡位遭遇重重阻礙，由此，亦能一窺「君臣大義」對東魏乃至北齊初年政治發展的深刻影響。²⁷¹

六、結論

北魏末年時人面對天下動亂的局面，莫不渴望出現如齊桓公、晉文公般的強臣穩定局勢，尒朱榮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躍上歷史舞臺。他打著「君臣大義」的旗幟，擁戴元子攸為帝，登高一呼，羣臣即為之景從，往後更「內除辟幸」為孝明帝復仇，也「外清群盜」，成就「桓、文之舉」。若非河陰之變，尒朱榮的歷史地位的確是「彭、韋、伊、霍夫何足數」。

高歡依循的也是尒朱榮稱霸的模式，在獲得六鎮十餘萬眾後與忠於魏室

²⁶⁸ 李延壽，《北史》，卷38，〈裴讓之傳〉，頁1384-1385。

²⁶⁹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231：「（高歡）知人好士、全護勳舊。」

²⁷⁰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60，頁4967-4968。

²⁷¹ 胡勝源，〈「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臺大歷史學報》第42期（臺北，2008.12），頁1-43。

的高乾兄弟、封隆之合作，以為孝莊帝復仇的「大義」名分在信都舉兵。不僅順利擊潰尔朱氏聯軍，更使斛斯椿等人背叛尔朱氏，兵不血刃便進入洛陽，建立起「桓文」般的霸業。然而他與孝武帝的關係卻急速惡化，也給賀拔岳開創「桓文舉」的機會，但賀拔岳卻被侯莫陳悅所殺，創造霸業的任務就由宇文泰完成。

宇文泰能接掌賀拔岳餘部可說是歷史的偶然。親魏諸將原本希望由孝武帝或死忠於孝武帝的賀拔勝總軍，在「遠水不救近火」的考慮下才擁戴資淺的宇文泰為首。在此情況下，宇文泰為穩固權力基礎，勢必要服從孝武帝之命，但孝武帝卻不斷要求他東下討伐高歡。宇文泰一邊上表藉故拖延，一邊又與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並高舉「君臣大義」旗幟征討侯莫陳悅。這使宇文泰在孝武帝及其親信的心中留下「忠君」的美好印象，這也是往後孝武帝入關的重要考量，賀拔岳夢想的「桓文舉」到此總算開花結果。

孝武帝入關的影響極為深遠，不僅讓關中從地方躍升為政權所在，更帶來東魏無可企及的正統性。「挾天子」的宇文泰不但能借此對內「服雄傑」、對外更能「從民望」、「致英俊」。驅逐孝武帝的高歡建立之東魏被視為「逆」，不僅延邊豪族群起為西魏奮戰，內部更叛亂紛起，人心動盪不安，讓高歡陷入「督將、士子盡投黑獺」、「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的深刻恐懼中。西魏國力雖遠不及東魏，但憑藉「君臣大義」，成為人心所歸的政權，得以在初期不利的環境下站穩腳步，與東魏長期對峙。高歡為穩定東魏渙散的人心，也高度推崇「君臣大義」，不僅尊崇孝靜帝至死，亦包容心向西魏的文武官員，使「遐邇歸心，(文)武皆思效力」，進而扭轉了初期「人情去留未定」的困境，這也使高澄、高洋篡位遭遇重重困難，深深影響了北齊初年的歷史發展。

附表1：「關中本位政策」推行歷程表

序號	時間	《周禮》體制	初期府兵制	出處	備註
1	大統八年 (542)	開始規劃。	初置六軍。	令狐德棻，《周書》，卷2，頁36；李延壽，《北史》，卷5，頁178；王應麟，《玉海》(臺北：大化出版社，1977)，卷137，頁2647；王應麟，《玉海》，卷138，頁2657；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151，頁4527；本文注4。	初期府兵制為《周禮》體制的兵制部分。
2	大統九年 (543)		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令狐德棻，《周書》，卷2，頁28。	西魏邛山之戰大敗。
3	大統十三年 (547)				東魏高歡歿，侯景叛。
4	大統十四年 (548)	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眾務猶歸臺閣。		李延壽，《北史》，卷5，頁180；令狐德棻，《周書》，卷2，頁36。	東魏高澄平侯景之亂。
5	大統十五年 (549)		開始大規模「賜(胡)姓」，並實行「代人復姓」。	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161-163；李延壽，《北史》，卷5，頁181。	東魏高澄遇刺。
6	大統十六年 (550)		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最晚出現時間。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143；唐長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254-255。	東魏高洋篡位建北齊。
7	廢帝二年				西魏平蜀。

	(553)				
8	廢帝三年 恭帝元年 (554)	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	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其姓。	令狐德棻，《周書》，卷2，頁34；令狐德棻，《周書》，卷2，頁36；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143。	1. 宇文泰廢廢帝改立恭帝。 2. 西魏征服江陵後，初期府兵制正式完成。
9	恭帝三年 (556)	初行《周禮》，建六官。		令狐德棻，《周書》，卷2，頁36。	1. 「關中本位政策」正式施行。 2. 西魏國力已與東魏比肩。 3. 此年北齊高洋「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卻因高歡失敗前鑑，不敢主動攻擊西魏。 4. 宇文泰歿，西魏恭帝於年末禪位於宇文覺。

附表2：東魏初年歸附西魏人士表

序號	時間	歸附者	內容	出處	備註
1	永熙三年 (534)	樊子鵠 大野拔	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為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眾就子鵠。	李延壽，《北史》，卷49，頁1793。	劉鷟、劉粹、乙瑗、辛景威、羊深亦參與其中
2	永熙三年 (534)	樊五能	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	魏收，《魏書》，卷77，頁1700。	
3	永熙三年	元洪威 趙繼宗	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	李延壽，《北史》，卷27，頁999。	元洪威後入西魏。

	(534)		招，據樂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內因雄之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台侯景討平之。		
4	永熙三年 (534)	魏玄	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	令狐德棻，《周書》，卷43，頁780。	
5	永熙三年 (534)	陳忻	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	令狐德棻，《周書》，卷43，頁777-778。	
6	永熙三年 (534)	李延孫 李長壽 韋法保	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眾。……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	令狐德棻，《周書》，卷43，頁773-775。	伊川李氏、京兆韋氏。
7	永熙三年 (534)	泉企 泉元禮 泉仲遵	帝西遷，齊神武率眾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齊神武不敢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	令狐德棻，《周書》，卷44，頁786-788。	上洛泉氏。
8	大統初	段永 趙業	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	令狐德棻，《周書》，卷36，頁637。	
9	大統初	韓雄	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眾至千人。	令狐德棻，《周書》，卷43，頁776。	
10	大統元年 (535)	張儉	先是，滎陽人張儉等聚眾反於大鵬山，通寶炬。	魏收，《魏書》，卷12，頁301。	
11	大統三年	司馬裔	及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在立	令狐德棻，《周書》，卷36，頁	西魏收復弘農後。

	(537)		功。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起義，遣使送款。	645。	
12	大統三年 (537)	敬珍 敬祥 張小白 樊昭賢 王玄略	與同郡豪右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等舉兵，數日之中，眾至萬餘。……珍與小白等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溫泉、虞鄉等六縣戶十餘萬歸附。	令狐德棻，《周書》，卷35，頁626。	河東敬氏、沙苑之役後。
13	大統三年 (537)	薛善 薛濟 薛馥 高子信	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	令狐德棻，《周書》，卷35，頁623。	河東薛氏、沙苑之役後。
14	大統三年 (537)	賀若統 張儉 鄭榮業 鄭偉 鄭頂 崔彥穆 檀深	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	令狐德棻，《周書》，卷2，頁24。	滎陽鄭氏、清河崔氏、獨孤信入洛後
15	大統三年 (537)	劉志	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潛遣間使，奉表長安。……大統三年，太祖遣領軍將軍獨孤信復洛陽。志亂合義徒，舉廣州歸國。	令狐德棻，《周書》，卷36，頁649。	南人之後、獨孤信入洛後
16	大統三年 (537)	邢摩納 盧仲禮 盧景裕	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盧景裕)同反，以應元寶炬。	魏收，《魏書》，卷12，頁302頁、魏收，《魏書》，卷84，頁1859。	范陽盧氏、獨孤信入洛後。
17	大統三年 (537)	趙肅	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	令狐德棻，《周書》，卷37，頁663。	獨孤信入洛後。
18	大統三年 (537)	裴邃	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為之鄉導，多所降下。	令狐德棻，《周書》，卷37，頁668。	河東裴氏、獨孤信入洛後。

19	大統三年(537)	鄭常	公諱常，字某，滎陽人也。……大統三年，起義華陽，授永安縣開國男。	庾信，〈鄭常墓誌〉，收於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985。	
----	-----------	----	----------------------------------	---	--

附表3：西魏初年歸附東魏人士表

序號	時間	歸附者	內容	出處	備註
1	大統元年(535)	可朱渾道元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眾內屬，神武(高歡)迎納之。	李延壽，《北史》，卷6，頁224、李延壽，《北史》，卷53，頁1901。	與高歡有舊、母兄在東。
2	大統二年(536)	万俟普 万俟受洛幹 破六韓常	夏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万俟普)及其子太宰壽樂幹(万俟受洛幹)率所部奔東魏。(破六韓)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高歡)起義，常為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幹東歸。	李延壽，《北史》，卷5，頁176、李百藥，《北齊書》，卷27，頁375、李百藥，《北齊書》，卷27，頁378。	高歡起兵反尔朱氏，万俟普遠通誠款。
3	大統二年(536)	曹泥 劉豐生	三年正月甲子……西魏靈州刺史 曹泥與其瑯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	李延壽，《北史》，卷6，頁225、李延壽，《北史》，卷53，頁1902。	曹泥與賀拔岳不睦。
4	大統三年(537)	元景安	隨(孝)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	李百藥，《北齊書》，卷41，頁542	元景安應為高歡安插在孝武帝身邊的心腹。
5	大統三年(537)	李叔仁	十二月，司徒李叔仁自涼州通使於東魏，建昌太守賀藍植攻斬之。	李延壽，《北史》，卷6，頁176-177。	侯莫陳悅死後「擁州逆命」。
6	大統四年(538)之前	狄湛 王保貴	被勒侍從(孝武帝)，隨到咸陽，深識順逆之機，悟知禍福之理，遂與建州刺史王保貴擁騎歸朝。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頁172。	狄湛為狄仁傑之高祖。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傳統史料

- 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
- 王欽若，《冊府元龜》，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
-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大化出版社，1977。
- 王應麟，《玉海》，臺北：大化出版社，1977。
- 王應麟，《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點校本。
-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點校本。
- 佚名，《歷代名賢確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點校本。
-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
-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南宮靖一撰、晏彥文續，《小學史斷》，收入天津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
- 胡寅，《讀史管見》，長沙：岳麓書社，2011。
-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
- 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
-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點校本。
-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點校本。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二)近人論著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

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何德章，〈《南》、《北》史之正統觀〉，《史學史研究》第4期(北京，1990.12)，頁76-78。

何德章，〈北魏末帝位異動與東西魏的政治走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武漢，2001)，頁51-62。

宋德熹，〈獨孤氏興衰史論〉，《興大歷史學報》，第2期(臺中，1991.06)，頁13-40。

周一良，《周一良集》，第1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變革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岡崎敬，〈隋趙國公獨孤羅的墓誌銘の考證〉，《史淵》，第83輯(福岡，1960.12)，頁31-62。

長部悅宏，〈北魏孝莊帝代尔朱氏軍閥集團再論(3)：王都——霸府體制を焦點にして〉，《地理歴史人類学論集》(沖繩，2010)，頁17-32。

胡勝源，〈東魏北齊的政治與文化問題新探〉，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胡勝源，〈「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臺大歷史學報》，第42期(臺北，2008.12)，頁1-43。

胡勝源，〈河陰之變新探：以尔朱榮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8期(臺北，2012.11)，頁1-50。

胡勝源，〈體制變革與魏周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長孺，《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

- 高敏，《南北史考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 陳寅恪講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
- 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0。

**On “The Great Duty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Subject”,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ab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Wei Political Powers**

Hu, Sheng-Yu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t the end of Northern Wei was a race to establish political power by rivaling warlords in the name of “the great duty between monarch and subject”. Gao Huan was able to defeat the Erzhu clan because he was deeply popular through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Great Duty between Monarch and Subject”. And the reason why Yuwen Tai was able to beat Houmochen Yue and make Emperor Xiaowu enter *guan zhong* and establish the Western Wei was also that he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Although Eastern Wei was a powerful nation, the confidence of its people was shaken due to the forced escape of Emperor Xiaowu. In view of this, Gao Huan was extremely respectful to the monarch and rather permissive towards corruptions. He repeatedly conducted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Western Wei in attempts to strengthen the legitimacy of his rule. Although Western Wei was weaker in its national strength, it was considered by its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large as the legitimate political power representing the Northern Wei. By “controlling the emperor”, Yuwen Tai could claim to “follow the people’s will”, “subdue powerful lords”, and “attract the talents”. It helped Yuwen Tai to establish hi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stage and

build the foundation to rival Eastern Wei in the long run.

Keywords: Wei-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Great Duty between Monarch and Subject, Eastern and Western Wei